



中评周刊 | 第 87 期目录

专题 | 文革式政审，何以卷土重来？

1. 红拂：政审你大爷 P. 2
2. 蔡慎坤：高考“政审”之说为何引发喧哗？ P. 4
3. 葛剑雄：政审，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伤天害理的事 P. 9
4. 李夏恩：不予录取：高考政审的诞生 P. 12
5. 刘胜军：高考记忆：邓小平删掉的这四个字价值万亿 P. 18

观点文章

1. 盛洪：改革下一步：抑制公权保护私产 P. 23
2. 肖雪慧：离谱的焦点偏移 P. 30
3. 王国乡：中美贸易冲突发生的国际货币制度根源与治理对策 P. 33
4. 辛允星：为“死磕精神”点赞 P. 44

随笔散记

1. 许章润：本钱与利息 P. 47
2. 安希孟：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P. 49

读书

- 阿特伍德：乔治·奥威尔：一些私人关联 P. 55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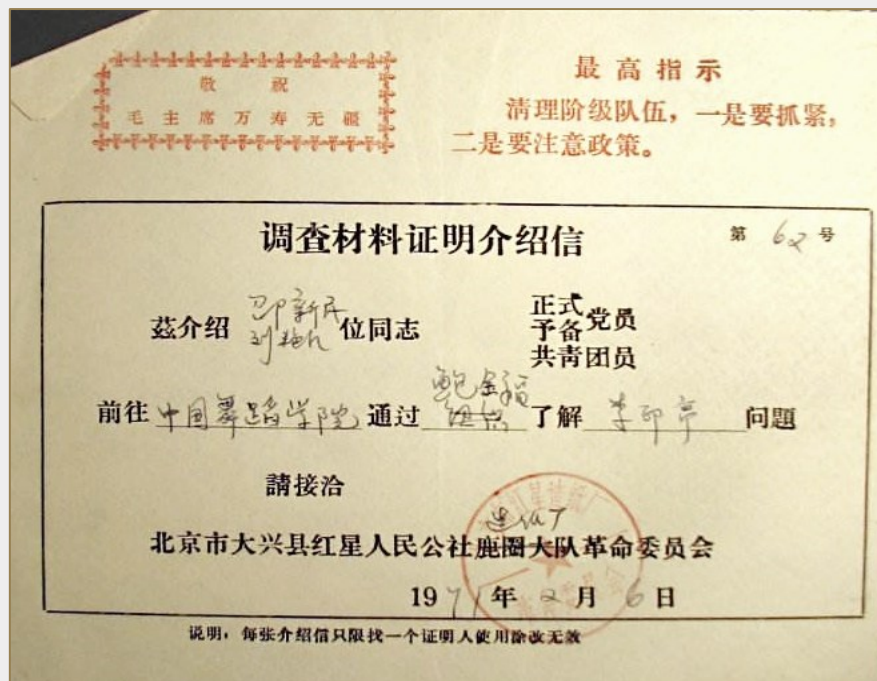
- 订阅 | 往期下载 P. 64

红拂：政审你大爷

[本文转载自网络，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重庆高考报名要政审的事儿火了，我一听，又乐了：有些东西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国很多政策荒谬绝伦，但制定者为自己辩护起来总是振振有词，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高考报名要政审？大学是你家开的吗？这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的意思是花纳税人的钱在办教育。你们收税时从来不觉得我们道德品质恶劣，不要我们的肮脏钱，凭啥到了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就嫌弃我们的孩子道德品质恶劣，不让报名考大学了呢？



中国文革期间的“政审”介绍信，
文革时期一条“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即会蜂拥而动进入积极地运动状态，
若谁不表现出积极踊跃、或可被他人调查整肃，即所谓“政审”

再说，这道德品质恶劣是怎么界定的？申请信息公开，要求知道有没有签过放弃唐努乌梁海领土的条约，算道德品质恶劣吗？道德品质恶劣与否，谁有资格来界定？制定这种规定的脑残，你自己的道德品质过关吗？这国有道德品质罪吗，有道德法庭吗？昭告天下要依法治国，私下里对纳税人的孩子进行道德审判，取消他们的高考报名资格，这事儿不荒谬吗？

说一千道一万，只要我们的孩子没犯罪，凭啥取消孩子的高考报名资格，剥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你们制定这种脑残规定的时候，查过宪法吗，问过纳税人答应不答应吗？你们的工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纳税人掏钱付你工资，是让你为人民服务来着，不是祸害人民来了。动不动就取消这个剥夺那个，这个收费那个涨价，不就是因为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吗？老以为老百姓的一切都是你们恩

赐的，忘了你们的一切都是纳税人恩赐的。

连五代十国的后蜀皇帝孟昶都知道“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那意思是当官的吃的是老百姓的饭，要知道感恩，欺负老百姓狠了，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在 21 世纪的今天，你们还不懂这道理，是脑残还是心坏呢？

重庆的教育官儿一看这事闹大了，出来否认说没政审这回事，“我们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越抹越黑了思想政治的考核？这是在治思想罪吗？如果思想有罪，那全国人都可以入罪，谁思想有问题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吗？

看过《肖申克的救赎》的瓜友可能都还记得，安迪辅导年轻犯人汤米考大学的事儿。犯人也可以考大学？没错，在美国，犯人也是可以接受教育的，部分表现好学业优秀的犯人甚至可以申请联邦佩尔助学金接受大学教育。美国有专门的监狱教育，对犯人进行职业技能和基础文化教育等等。不仅美国，欧美国家都有类似的监狱教育系统。

有人可能会质疑说犯人凭什么接受教育，这不是在变相奖励犯罪吗？不是。欧美国家推行监狱教育，是因为犯罪率高的人群往往也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因此他们认为让犯人接受教育，刑满回到社会后，二次犯罪的概率会大幅降低。

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英国司法部的统计显示，有了监狱教育后，二次犯罪率降低了一半以上，从而为司法系统节省了大量预防犯罪和起诉罪犯等等的开支，也就是说监狱教育替纳税人省了钱，也提高了纳税人的安全保障。

监狱教育，一方面拯救了犯人的后半生，一方面保护了纳税人的钱袋和安全。相信犯人也能通过教育洗心革面，是人道至上的文明理念，绞尽脑汁为纳税人减负对纳税人负责，是饮水思源的现代执政理念。说白了，人家的政府，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是谁养活了谁，谁该为谁服务。

教育的目的本来就是育人，通过教育让孩子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为社会发展贡献一己之力，也活出幸福快乐的自己。连犯人接受教育后都能洗心革面，更何况还处于思想成长期的孩子？以思想政治审核的名义剥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岂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与目的？人家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信心教育好犯人，N 个自信的你们倒没信心教育好孩子吗？

以思想政治审核的名义剥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说白了就是把公民该有的权利当做奖赏与筹码来控制孩子脑子里想什么。孩子连思想的自由都没了，还会有创造力吗？难怪泱泱大国十四亿人口却造不好一个小小的芯片，造不好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尖。也难怪国产骄傲华为手机竟然是日本人研发的。

有些东西，长点心吧，别老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把全国人的利益和权利踩在脚底，把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当儿戏，当心“上天难欺”，装逼遭雷劈！政审，审你大爷！

[【返回目录】](#)

蔡慎坤：高考“政审”之说为何引发喧哗？

[蔡慎坤 学者、投资专家，曾先后在政府、媒体、企业供职，著有《海南十年反思》、《谁来拯救中国股市》与《股民辞典》等书]

11月8日上午，一条来自《重庆日报》关于重庆高考报名的消息轰动网络，官媒文章明确：“2019年普通高考11月7日开始报名，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而具体“政审”不合格的指标包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此外，报考军警、公安以及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公安部门 and 院校会对考生进行再政审。”“政审”一词挑动众人神经，在公众舆论乃至微信群中引发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议。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时间联系到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办公室主任罗胜奇。罗胜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关于政审是媒体记者写错了。我们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记者把这个理解错了，就出了一个‘政审’。重庆市严格按照教育部的精神，文件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做变化。只是记者的片面误读。往年一直都是按照教育部的文件来的。一个字都没变。”

罗胜奇声称，往年，重庆市也都会对考生进行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至于往年是否有考生因为这一项不合格而不允许参加高考，他回应说，“因为我不是业务组织的。应该是没有，具体我还没办法准确告诉你。”（中国新闻周刊）

《新京报》记者石茹也证实，重庆市将于11月7日至16日开始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此次引

发公众强烈关注的是，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对外发布的消息明确，考生的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

这条消息来源于经认证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重庆招考”。该微信公众号在 11 月 2 日发布《重磅！我市 2019 年普通高考报名下周开始！考生关心的热点问题都在这儿！》，该文对“政审怎样进行？政审主要有哪些内容？”等问题作了详细解答。文章称，政审的结论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类，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

“重庆招考”称，所谓政审就是对考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及现实表现进行审核。这项工作主要由考生所在的学校或单位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以及学习、工作等表现作出全面鉴定。文章列出了三种情形属政审不合格：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报考军警、公安以及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在备注中单独列举，该文称公安部门和院校会对考生进行再政审。

根据百度百科，政审指政治审查，政审工作一般应由基层组织负责进行。政审的内容和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要求不同。一般来说，在参军、入党、竞聘公务员等情况下需要政治审查。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的工作人员称，综合素质评价报告是教育部要求的。

据悉，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政审反映在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以《重庆市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呈现，作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是高考录取时的参考依据。

《重庆市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由重庆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生成和打印，分为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电子档案将在录取时提供给高校；纸质档案装入学生档案，交给录取高校存档。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女士

从上述权威消息来源来看，重庆当地官报记者并没有写错也没有误读，高考“政审”之说绝不是空

穴来风，而是来自教育部的明文规定，这就使得整个舆论场感到了嗖嗖的寒意。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恢复高考意味着一场全民浩劫的终结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受教育权本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不能任由哪一级政府和部门剥夺，除非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方面做出变更。

当年主持恢复高考工作的原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听闻这个消息，觉得不可思议，称“政审”之说明显是在“倒退”，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还非常清晰地表述，当年恢复高考最重要最关键之处就是高考看成绩，彻底改变并抛弃靠“政审”推荐上大学的既有政策，如果当年还要搞“政审”，今天千千万万活跃在各个领域的社会中坚根本不可能走进高校，中国改革开放更是无从谈起。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恢复高考的问题，邓小平针对高考“政审”连说三个：“繁琐！”，大笔一挥所谓“政审”条件全部抹掉。谁也没想到，时隔40年之后，曾经影响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命运的“政审”又死灰复燃。

高考“政审”在四十年前是常态，更有一段时间，“白卷英雄”轰动全国，许多识字不多的“又红又专”青年被推荐上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几乎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有点知识有点思想的老师都被关进“牛棚”或者失去了站讲台的机会，能够站在讲台上的，大多是不学无术投机钻营之辈，因而导致中国教育和各类专业人才在很长时间出现断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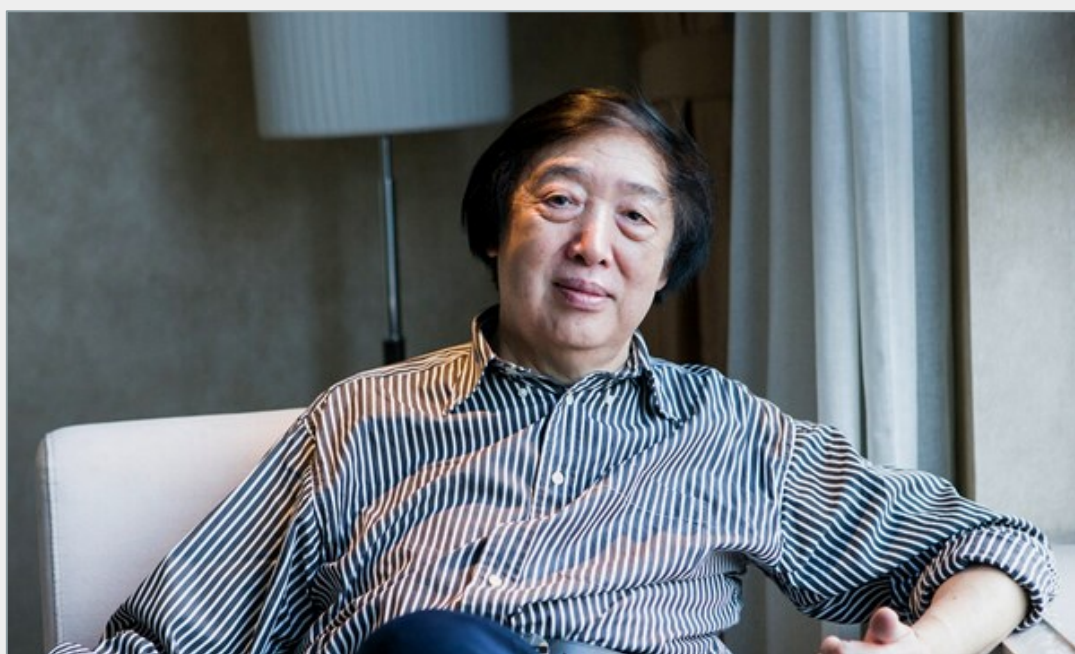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剧作家**吴祖光**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9 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有知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回忆文章，谈及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的遭遇：“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 3 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 7 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 70 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当年高考“政审”的受害者，谈及那段往事，冯骥才依然心有戚戚，“我 1961 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



作家、画家冯骥才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当年高考“政审”的受害者。钱宗仁 1963 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 年钱宗仁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 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 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只好被迫到新疆谋生，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 年《胡杨泪》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才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肝癌晚期，于 1985 年 10 月 1 日凌晨去世，年仅 41 岁。

享誉海内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华人经济学家，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杨小凯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具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的佼佼者。当年杨小凯因在长沙一中学读书时，

写过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1968 年被判刑十年，当时年仅 20 岁。

1979 年杨小凯出狱后，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过，1980 年又被于光远收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实习研究员，1982 年，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得知杨小凯非常有才华，派人到湖南把杨小凯和妻女的户口调到武大并聘杨小凯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1983 年，杨小凯又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1988 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1990 年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如果当年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政审”“不宜录取”的命运，相反，当年那些因“政审”“不宜录取”的优秀学子，如果有人被命运改变走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贝尔奖项绝不是痴人说梦。当年高考“政审”曾经是千千万万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只不过现在许多人太过健忘或者说被迫遗忘，我不知道新的“政审”之说让谁惊恐？又会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什么样的创痛？！

[【返回目录】](#)

葛剑雄：政审，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伤天害理的事

[葛剑雄 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转载自《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四辑，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葛剑雄教授

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或许我会一辈子做这样一件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伤天害理的事。

所谓“政审”，就是政治审查的简称。这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前每个成年人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所必须经历或熟悉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说，人人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的“政审”。

从1968年开始，我被挑选进了所在中学的“材料组”（专案组的别称），参与审查运动的对象。一年后，学生开始上山下乡，接着又有了毕业分配，我兼做学生的毕业政审。文革后期共青团的活动恢复，我担任了校团委书记，又需要对入团对象作政审。直到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离开中学，我做了十年的政审。

中学毕业前就需要政审

在当时的上海市区，学生到中学毕业前，就必须进行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的政审，填写一张政审表，放进学生档案，转入他（她）下阶段的工作、学习单位或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在毕业前的半年，学校就要派人去每位学生家长所在单位，通过查阅本人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父母双方材料齐全后，由政审人员填写表格，摘录的材料作为附件，放入学生档案。

查档案需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专用介绍信，接待单位只认县级以上的公章，专职人员一看公章的口径就明白了。按规定，政审人员只能查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对象，如团员或群众不能查党员的档案。

每次政审，我们将名单交给学生家长单位的人事部门，去抄上两三天，百来份政审材料就完成了。但一大半家长的单位都是分散的，得一个个去，太远的，一般都发函调。

毛 主 席 语 录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龙仁松：你处职工 刘凤山 是我校 四 连 二 排学生 刘研君 之家长，为做好对学生家庭审查工作，请按下表填好，加盖公章后寄给我校。

学生政治审查表

单位：（公章）

查人	现名	家 庭 出 身	政 治 面 貌	年 生 年 月 日
	刘凤山	中农	群众	1933.12
名 别 名		本 人 成 份	与 学 生 关 系	文 程 化 度
		21	父亲	高中

文革时期哈尔滨市六十中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学生政治审查表》

1976年6月12日

从政审中，我看到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

我政审的对象大多属“劳动人民”，档案袋中只有薄薄几张纸。但“有问题”的人档案会有几大包，如何能不错不漏地摘录，又节省时间，既需要正确判断，也得依靠经验。刚开始时我逐张翻阅，速度很慢。后来才知道，自传、检举揭发材料、旁证材料、调查笔录等不必看，只要找到主要表格或审查结论就可以了。

有时翻到一大包材料，出于好奇，我会仔细阅读，倒了解不少平时从来没有机会了解的情况。其中不乏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使我感受到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如一位被枪决的“恶霸地主”的全部材料就是一张草草书写的“判决书”，没有任何旁证材料。检举揭发他人的信件，特别是针对领导的，往往留在本人的档案中，还加上领导要求对该人调查的批语，甚至已作了“恶毒攻击”、

“阶级报复”等结论，可怜本人还一无所知。

解放初，绝大多数人填表格或写自传时都极其忠诚老实，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自认为出身、经历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惟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那些要求入团入党、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更将这当作相信党的具体行动，往往连道听途说的话也会当事实交代，心里有过的想法也要汇报。如有的人解放前当码头工人，拉黄包车（人力车），为了相互照顾，拜过把兄弟；或者为了寻求庇护，拜过师父。所以在填写社会关系时会写上：结拜兄弟某某系恶霸，被政府镇压。师父某某，听说逃往台湾。有人上过大学，会将同学作为社会关系——列出，其中免不了会有“去美国留学未归”，“随蒋匪逃台”，“是三青团骨干”等。于是，明明本人属“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或党员干部，却已列入“内部控制”，在档案中写上了“有反动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复杂，有逃台蒋匪特务”。到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往往成为重点审查或批斗对象，甚至成了“里通外国”、“敌特嫌疑”，本人受罪，还祸延子女，使他们在入团、分配工作时受到种种限制。

毕业家庭政审一般限于父母，但父母双亡的则还得调查抚养者（监护人）。如直系亲属中发现有“杀（被判死刑）、关（被判徒刑）、管（被判管制、劳动教养）”对象，则还得补充调查，至少要抄到正式结论。

“学生政审”使许多学生被打入另册

当时，这份政审表格成为学生档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管是下乡还是就业，都要带上。有的单位要先看档案，审查合格后才会接收。

政审表格是不与本人见面的，班主任和其他教师也不能看，但对分配有一定限制的对象，会给相关教师提醒一下，不一定透露具体内容。教师往往颇感意外，甚至大吃一惊，一些最钟爱的好学生、学生干部就此与某些机会无缘。

在这十年间，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或许我会一辈子做这样一件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伤天害理的事。

如今，我作为复旦大学的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先后接收过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新员工。他们都有档案材料，但我从来没有去查过他们的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我重视的是面试，看重他们的实际能力和表现。每当他们被愉快地录取，或拿到毕业证明、获得学位时，我不由得感叹：“年轻人，可知道你们有多幸运！只要凭自己的努力，你们就能获得这一切。”

[【返回目录】](#)

李夏恩：不予录取：高考政审的诞生

[李夏恩《凤凰周刊》记者，《新京报》特约撰稿人，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编剧。本文转载自2018-11-14 微信公号：《东方历史评论》ohistory]



本文作者李夏恩

暑气熏腾着肃穆的考场，一名 19 岁的考生小心地将手绢垫在腕下，以免汗水弄湿了考卷。但比起考场上的奋笔疾书，郑州师专附中高中三年的苦读更让赵园难忘。她还记得冬天“半露天的厕所里一地厚雪”，她与留在学校的同学，“将课桌围了火炉坐着，各自复习功课”。临近高考，“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宿舍熄灯后，还有同学在走廊上甚至厕所里准备功课”——这些琐碎零散的备考细节，即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都不过是任何一名普通的高三考生都可能会有的经历。

但这是在 1964 年，压在赵园肩头的不仅有课业的负担，现实环境也不断提醒她还背负着另一个沉重的包袱。她的母亲在六年前的政治运动中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正在上小学的赵园也因此牵连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同学们古怪的目光、背后切切察察的私语”，她的少先队大队长职务被罢免，被迫公开表态与自己的右派母亲划清界限。在初中的农村劳动中，这个瘦小的女孩表现出比大学生还大的干劲，作为“右派”的女儿，“唯有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获得同学的谅解。母亲的“罪行”也成为了她身上的“原罪”。家庭背景带给赵园的，是一个“被用了火烙上的，再也不能刮去”的“贱民印记”。

这种“印记”，在当时的正规说法叫做“出身”。这是 1949 年后井喷般涌现的众多政治术语之一，但比起那些宣传口号中的流于唇舌之间套话，“出身”这个词则深深地楔进每个人的身上，它是一个巨大的口袋，不仅盛着这个人自己过往的历史经历，还包括他的家庭背景和亲友关系，而家人亲友各自

的出身同样也囊括其中——这是一个无比沉重同时又不断扩大的包袱，每个人的出身包袱里装着所有与自己相关人的出身，其他人也亦复如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出身关系就像铁链上的链扣，任何一个链扣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出身的沉重包袱砸在自己身上，招致严重的后果——对高中学生来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高考。



赵园的一名全姓同学就是个典型例证，这名表面看起来非常沉静的男生，吹得一口好铜笛，“每有联欢一类的活动，照例被邀来献艺”。在毕业离校前的告别晚会上，这名男生最后一次在同学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艺，但对他的同学们来说，铜笛这项唯一能引人注意的薄技不过是让人欢笑一时的陪衬而已。赵园心知不论这名同学考得如何，“结果总不会理想”。他的父亲背负的罪名比赵园母亲的右派帽子更加可怖：“历史反革命”。

1. 考试：政治即是一切

诚如赵园所认识到的那样，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学生来说，考试的目的已经不再像 1949 年之前，只是简单地测试人的知识积累和学习能力，知识是排在第二位的，重要的是“政治”。对普通民众来说，1949 年后的“政治”定义与人们惯常理解的“政治”有很大不同，它指的不是一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具有参与国家政事管理的能力，而是在政权无所不包的支配体系中，认清自己被安排的身份和地位，以便在国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正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政治”当先的时代，高考自然概莫能外。但在刚开始时，高考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润物无声的，高考语文试题是个绝佳例证，展现了如何将正确的政治思想，通过预先设定好的标准答案的考题灌输到考生的头脑中。1952 年首次全国统考的阅读题是《一个走上正规的合作社》，就是一次考场上的政治文宣，让考生在概括文章主题时接受了一次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教育。

1955 年的阅读选用了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则是让考生亲笔写下自己对这个刚刚成立六年的新政权的自豪感。

唯一能发挥考生个人意志的作文题，也同样不能偏离政治的绳墨。1953 年作文题目《记我所认识的一位革命干部》毫无疑问是对上一年“三反五反”中干群关系调整的一个回应，而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双百运动”高涨的 1956 年，作文题目是《生活在幸福的年代》。而在赵园参加高考的 1964 年，作文的题目是《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作文材料讲述了“支援灾区物资征集部门的同志，在汇集、清理各地捐献物资时，发现了一袋干菜里居然藏着牛肉。他们深受感动，然而又无法查明干菜的主人，故只好借助报纸来表彰这种克己助人的行为”。这篇报道看似只是单纯表彰一种“克己助人”的行为。但只有从关心“政治”的角度理解背后深意，才能拿到高分。

一篇被评为优秀的范文就成功参透其中妙义，“当年轻的新中国刚跨进六十年代时，国内外敌人和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就给我们带来了特大的困难。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党把人民组织成一支坚强的队伍，他们同心同德、自力更生、休戚与共、相互支援，去战胜那亘古未有的灾难”。藏在干菜里的干肉，也就成为了匮乏年代克己忍耐、毫不抱怨和奉献国家的象征。在文章的最末，作者由赞美个人的品质，升华到赞美能出现这种美德的政治制度：

“回想起这一切，我们怎能不由衷地唱出‘社会主义好’的赞歌呢？又怎能不为这样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所深深激动呢？我以生在这充满团结友爱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而自豪！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忘我无私的人民而骄傲！”

不过，对那些“出身”有问题的考生来说，即使写出如此政治正确的作文，在考官那里拿到高分，也很难进入他们心仪的大学。政治气息浓重的考试只是第一道关卡，而守在大学门前的最后一关才是决定一切的：对出身的“政治审查”。

2. 政审：从苏联到中国

“政治审查”并不是新政权的发明，而是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苏联，在 1920 年代提供给共产国际支部中共的一项强有力的政治武器，通过对个人出身和政治思想动向的调查，用来筛选出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同时清洗掉那些潜在的危险分子。从 1922 年中共二大中的入党审查，到瑞金时代的苏区，再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这套制度已经相当完备。1949 年新政权成立后，只是把这套从苏联借鉴已经成熟的制度推广到全国而已。

尽管政审制度严密完备，但却很少有人能将其表述无遗。个人填写的履历只是其中之一，同事和领导看法意见，家人朋友的谈话聊天，甚至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被身边的人记录下来，上报有关部门，成为日后政治审查的依据。升学、入职、转岗、升迁，每一个决定人生未来的重大变动背后，都跟着一张甚至是一叠政治审查表。而审查表上最后一项上“政审意见”将决定这个人的最终命运。



20 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肃反运动，
推行的荒唐残暴而野蛮的镇压，
史称“大清洗时代”，使苏联至少三百万人被处死、二百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

高校招生的政治审查起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所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创建的高等院校，是中共培养干部的基地，因此，它需要从报名者中筛选出符合干部特征的候选人。苏联人对以往中国高校学生充斥着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些“黑色出身”这一点相当不满，因此政治审查的重点就是出身，要选拔出符合新政权意旨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红色出身”的子弟来修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这个“严重错误”。

在新政权眼中，“红色出身”具有天然的向心力，是新政权使他们从一无所有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因此他们对政权的忠诚不容置疑。但此时新政权正忙于清理前政权的遗存，既无暇将自己的理念灌注到高校之中，也不能表现出对那些被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疏远之意，后者此时与党的关系仍然是盟友而非需要改造的对象。在 1949 年 8 月颁布的《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中，对大学生的选拔标准只有一句话：“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经入学考试合格者”，1950 年 5 月 26 日，新成立的教育部颁布的招生规定中，也只加上了“凡志愿为人民服务，身体健康”这样宽泛的条件。

但到 1952 年，随着私立高校的公立化以及“院系调整”的最终完成，新政权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高等教育资源。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显示了新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教育资源的绝对支配力。朝鲜战争爆发掀起的反美运动，也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得以遂行。充足的条件使 1953 年高考政审制度正式出台变得顺理成章。在这一年的招考规定中，工矿农场中工龄在三年以上的工人、本人是工农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农成分且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干部都可优先录取，但对那些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干部，优先录取的条件则提高到“参加革命工作五年者”。而至于那些不被允许参加高考的人，则被刊载在另外一份政审文件上。

在最初的审查标准中，只有四类人被排除在高考之外：“现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因反革命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除的分子”以及

“历史上有重大政治嫌疑者”。对最后一类，政审人员被要求在考生登记表上签具“不宜录取”的意见。

此时，出身不好但自己尚未过失的考生尚可侥幸入学，不会受到家人的累及。但1955年7月14日，高等教育部呈送的该年招生工作的简报，却指出让这些考生通过政审，是工作的严重问题：

“政治审查工作方面，西南地区原来存在着严重问题。由于专区对四部联合通知贯彻不够，在介绍社会知识青年报考时很不认真，高中毕业生的评语，一般只反映学生在校的一般表现，未涉及学生本人的政治面貌、家庭情况与主要社会关系。就四川省中学情况来看，一般学生的家庭情况与主要社会关系较复杂个别中学的毕业生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其家庭成员被我杀、关、管者”。

政审标准即刻加以修订，在不宜录取的名单上又加入了“直系亲属被我处死而本人坚持反动立场者”。出身成为了政审标准之一。不过仍然有一些考生成为漏网之鱼。参加1956年常州考生邱学华。尽管父母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但他同样参加了高考，并且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但他未来的妻子，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1957年参加高考的葛蕴春，却因为家庭出身是“历史反革命”而被内定为“不予录取”。

到1958年，不予录取的政审名单变得更长。除了直系亲属被处死外，直系亲属有“因政治问题被判处徒刑、管制或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有反革命分子、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情形都不予录取，除了直系亲属外，“亲密社会关系”出现上述问题的考生，也不在录取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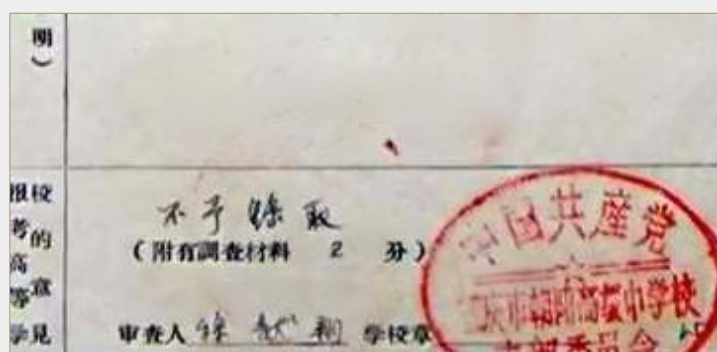
亲属和友人或许还可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侥幸免脱，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个人永远无法摆脱的是他的家庭出身。在政审标准开列的不予录取的最后一项，就是“地主、富农和反动官吏等剥削家庭出身，没有划清思想界限，表现落后的”。

3. “不予录取”

“不予录取”四个字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那些自己并无过失但家人亲友犯罪，出身不好的考生政审表上。尽管问题考生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可能是政审未过的名单上的一员，但政审人员是如何评定的却是个谜。迄今为止，尚未有一名昔日的高考政审人员现身说法，回忆自己是如何在考生的政审表上写下那四个令人绝望的大字的。一些有自知之明的问题考生，会特意在志愿书中填报一个高校序列中位于末端的冷门院校，试图用卑微来博得政审员的同情，让他对自己的大学梦放过一马。

但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先知先觉，他们往往是在最终结果公布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是“不予录取”或“降格录取”名单上的一员。1958年的开封考生吕延梅就接到了一封诡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名成绩一向优秀的考生报考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她的高考成绩也让北大发出了那封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但当通知书送到她手里时，“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了‘开封师范学院’，又被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可以想见政审人员为了粉碎她的北大梦如何殚精竭虑，而唯一的原因只是她的出身是富农。

吕延梅的遭遇尽管看来荒诞，但也透露出政审员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不予录取率的分母上增加分子。就在赵园参加高考的 1964 年，高教部在上报的招生工作简报中，以一种刻板但却不失赞赏的口吻写道：“全国不予录取的考生比例，由 1963 年的 3.6% 上升至 1964 年 7.07%”，这显然是高考政审工作日趋严格的一大进步。简报中也批评了判卷人，认为他们在评分时没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作文评分标准中提到，对于立场观点有严重错误、思想感情极不健康的文章，要扣分或给予不及格分数，而没有指明这种作文不应该给分，这种学生根本不能录取”。



这种情势下，赵园全姓同学的结果可想而知。唯一让自己孩子不受家庭出身牵连的办法，就是双方划清界限。全的“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就选择离婚来保全自己的儿子，但即使如此，“人们仍以其为某种子弟，并非就能如期待那样脱清干系”。

赵园的“右派”母亲也险些遭受同样的下场。在熬过了劳改、孤寂和疾病后，这个瘦弱但坚忍的女人还是被她可能带给家庭不幸催垮了。1962 年的一个星期六，当着孩子和丈夫的面，她的眼泪像决堤一样痛哭起来，最终凝结为一句话：“我和爸爸离婚吧，离了婚，彻底划清界限，就不会连累你们了”。赵园和他的父亲姊妹围了过来，伸手为母亲拭去眼泪。

赵园的幸运在于，不久之后，她的母亲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摘帽右派”比起“反革命分子”是轻得多的罪名。她在高中里的优异表现也让老师青眼相加，甚至为了保障升学，动员她入了团。

许多的偶然，为这个 19 岁“自信而任性的孩子”，在苛刻的出身政审荆棘中找到了一条通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幽微小径。而更多像她一样成绩优异的人，却被这些拦路的荆棘刺得鲜血淋漓。当赵园进入北大后，很快发现“同班同学中，多半有着‘工人’‘贫下中农’‘革干’‘革军’一类‘响当当’的好出身。对于自己竟然混迹其间不免暗自惊异。”她也发现这些同学在上课时“格外起劲地记笔记”，并不是因为求知若渴，而是为了备足台上老师的批判材料——暗流汹涌激起的微澜。已经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两年后，在运动中已经学会政治敏感的赵园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在临睡前将小手绢衔在口中，以防自己不自觉梦呓引来那些偷听的耳朵。 ■

[【返回目录】](#)

刘胜军：高考记忆：邓小平删掉的这四个字价值万亿

[**刘胜军**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曾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刘胜军微财经 ID:caijingknowledge]



本文作者**刘胜军**

40 多年前的 1977 年冬天，570 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最终 27.3 万人走进高等学府，成为“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被录取的幸运儿，其中就有李克强总理。高考前，他还是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那一刻，不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也从此扭转。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邓小平的一锤定音开始。

1. 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知青，特指从 1968 年代开始一直到 1978 年代末期为自愿从城市去到农村和农垦兵团务农或建设保卫边疆的年轻人，这些人大多数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1966 年文革爆发。文革导致高考停止，到 1968 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

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

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随即，大批年轻人下乡去农村，每年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在约 1200 万至 1800 万之间。



1977 年恢复高考现场

2. 邓小平拍板

1977 年 9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 10 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但会议的细节却是历史的激荡。

1977 年 8 月，年仅 31 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正在上海家中过暑假，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中央办公厅给你一个电话，邀请你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希望你明天赶到北京，参加这个座谈会”。

这个重要会议由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亲自主持，参会者有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授、清华大学何东昌教授、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教授、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教授等大咖。

温元凯是唯一一位 40 岁以下的代表。

8 月 4 日上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邓小平开场就说，他向中央请命分管科技教育，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想了解大家对科教发展的想法，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看法，尽管发言。

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最后不得不以“点名”发言的方式打破沉默。首先发言的是年纪最大、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教授。

温元凯说：“没想到杨石先教授一开口就开始自我检讨，他说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

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我注意到邓小平皱了好几次眉头，他也不好意思打断老先生的发言，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位发言的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助手——18 位副教授和讲师都被下放到农村、工厂，自己成了“光杆司令”。邓小平当即表态，把苏步青的助手全都调回来。

座谈会开到第三天，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谈到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痛心疾首，“一石激起千层浪”。

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突然开炮，直指当时的高校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温元凯说：“我就举手插话，我说小平同志，当前教育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我提 16 个字叫：‘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的发言立刻就对我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大家当然都愣了，什么叫四分之三？他说，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被邓小平删减后的高校招生方针变成了：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座谈会召开时，当年的高校招生方案已经下发全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

温元凯回忆：“邓小平很厉害，马上就说能不能收回，我们推迟几个月，今年恢复高考，否则我们又耽误一代人。我当时记得邓小平讲完这句话，表完这个态，我们人民大会堂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年轻女孩子们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我们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了中国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邓小平对温元凯讲：“你可是我们这次代表中间最年轻的，今年才 31 岁。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一

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否则要打棍子”。



1984 年，温元凯的专著《中国的大趋势》问世，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波，温元凯成了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1988 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温元凯于 1984 年在合肥召开了“新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讨论会”，成为我国企业改革的先声，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民间发起的大型全国性集会。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合影

3. 高考往事

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 8 年知青后，1977 年参加高考，当时是 24 岁的“高龄考生”，当时外语学院招生规定考生不能超过 25 岁，王毅差一点与大学失之交臂。1978 年，他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就读于日语专业。

1974 年，从内蒙古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后，18 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 60 多公里远的红格尔公社插队。

郭树清是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知青之一，他对付寂寞和劳累的方式是读书。当年在红格尔公社民族用品厂上班的董正义，一直记得“挺瘦挺高、白白净净”的郭树清给知青们讲“剪刀差”这个

经济学名词时“头头是道”的样子。

1978 年，郭树清考入南开大学，虽然插队耽误了几年，但郭树清仍然属于年龄小的学生，有的同学直接喊他“小郭”。

1977 年，许家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报名，但因为时间仓促，没有考上。第二年，许家印复读再考，伴随地瓜和小麻油挨过了寒冬，1978 年如愿考上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在人口达 1000 万的周口市，他的成绩位列前三。

1979 年高考前 8 天，潘石屹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

俞敏洪参加了 1978 年的高考，英语却只考了 33 分。

1979 年，俞敏洪再次参加高考，英语只考了 55 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是 60 分。

1980 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 40 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 95 分，总分 387 分。俞敏洪如愿被北大录取。

4. 铭记“改革的精神”

2018 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移世易，改革的内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邓小平在恢复高考决策的“改革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 历史责任感：不能再耽误一代人
- 市场化：删除“领导批准”
- 执行力：发出去的文件再收回

张维迎认为邓小平是“真正的改革家”：

- 就像上世纪 80 年代那样，有广泛讨论、有学术界大胆地参与。
-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 这意味着领导人要有很强的理念，要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让理念战胜利益。 ■

[【返回目录】](#)

盛洪：改革下一步：抑制公权保护私产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采访者：FT 中文网编辑 王昉；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著名经济学家**盛洪**

编者按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就产权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接受 FT 中文网编辑王昉专访，回顾了私有产权从改革之初的被保护与鼓励、到近年日益被公权力觊觎的过程。他认为，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夺，已接近临界点，一旦越过，可能导致经济崩塌的后果，改革当务之急在于限制公权力。以下为编辑后的访谈实录。

FT 中文网：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时，产权理论经常被用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理论也被视作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引入的最重要的西方经济理论。能否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理论和中国改革是怎样相遇的？

盛洪：产权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一部分。制度经济学的一个信念就是，制度是重要的，制度影响行为，行为影响效率。它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源于制度变迁。产权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产权理论相信，产权制度如果朝一个好的方向变化，一定会带来效率的提高，长此以往带来经济的发展。科斯、诺斯、张五常等学者发展出的这个理论，改革开放初期逐渐介绍到中国。

FT 中文网：中国在 1978 年启动改革时，产权已经几乎完全消失？

盛洪：严格来讲不叫消失，而是一种较低效率的产权，在农村叫做集体产权，一大二公，三级所

有，实际上就是没有私有产权了。

这里要注意，产权(property rights)和所有权(ownership)是有区别的，产生的背景也不一样。产权(property rights)源自普通法背景，意味着它没有所有权的那种绝对性质，比较灵活，是有关人的行为的权利。所有权(ownership)是大陆法的概念，强调对物的所有权是最起作用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中国历史上，从汉开始，经唐宋明清几代，一直到民国，土地都是私有的。在很多地方土地分成田面权和田底权。田面权类似于经营管理权，是一种产权(property rights)，田底权类似于所有权(ownership)，其实也是一种产权。在普通法国家中，这两者是平等的。田面权和田底权是可以独立买卖或转让的。所以在中国民间一直有这样的智慧，“两权分离”并不是英国人的独创。到人民公社时期，把私有产权消灭掉了，而消灭私产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生产力下降，导致大饥荒。



位于深圳深南大道的**邓小平**画像，
不少企业和市民到此以各自的方式向邓小平表达缅怀之情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没有发生一场名义上的产权变革，比如说并没有把集体产权变成个人产权，但实际上发生了一场类似于产权变革这样的变革。在农村，改革者说，我们绝对不会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我们要激发农户的积极性，我们就以改变“合约”的办法来做，实施包产到户。在城市，国有企业产权还是国有的，但出现了承包制，代表着一种新的分配方式，和农村一样，不是一种产权变革，而是一种合约变革。

这里就要提到张五常教授的合约理论，我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他认为，产权可以分解成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只要能使用、获得收益，并且能够转让，就够了，名义上有没有所有权并不重要。而包产到户正是说，农户种这个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之后，“剩下都是自己的。”

剩下的包含什么？就包含了使用权、收益权，还有部分的转让权。

张五常的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 80 年代初的中国，把集体产权变成个人产权，在政治上是不可操作的，但是要说搞包产到户，就只是在合约层面发生变化，政治上的阻力就变得非常小，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接受，在中国农村实施，产生了特别好的结果。就是张五常说的，虽然好像不是产权变革，但它非常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变革，就会产生类似产权变革的结果。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国内的经济学者，在接触到制度经济学理论后，就特别信服，觉得它很棒，解释力很强，就不断写文章介绍它，不断用这个理论去分析，不断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后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工业，这个理论就逐渐就进入到中国改革的话语之中了。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受到产权理论的推动。民营企业不用说了，肯定是建立在产权基础上，而国有企业也是参照这个理论来推行公司化改革的，政府提出“产权明晰”这样的口号，中共从十四大到十六大的决议都包含这些口号，可以看出产权理论已经进入主流话语。

FT 中文网：张五常教授在 1981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预测，中国会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最终会变成一个私有产权的社会？

盛洪：对，他说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有一个基础，就是私有产权。在当时，很难想象中共会倡导私有产权。但是张五常的理论说，名义上是不是私有产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他一直盯着这个方面，认为只要有这些权利，结果是差不多的。他当时就预见到，我们不需要经过紧张的政治对抗和暴力革命，不一定要改变产权的性质，只要合约变了，改革就能走通。他在这点上和别的经济学家不一样。别人可能认为，一定要先把集体土地所有制改变为私人土地所有制，才能进行改革。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错误，因为教科书说市场经济一定要有私有产权，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怎么发展市场经济？张五常就认为可以，这是他很重要的预见。

FT 中文网：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产权制度以合约变革的方式推进。之后呢？

盛洪：之后有一个后续的发展。比如说，包产到户后涌现出一些比较能干的农民，他们积累了一些财富，最开始表现为一些货币或生活用品，其实就已经是他们的私产。然后他们面对下一步：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是不是可以用来投资？他们拿积累的货币去买一些设备，盖一些厂房，就出现了乡镇企业，他们就成了资本家。从乡镇企业再发展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已经完全是私人产权。所以张五常说的改革路径非常重要。如果一开始就让大家去办私营企业，第一意识形态不接受，第二也没有钱。这个私人产权应该是在增量上变出来，而不是在存量上变出来的，原来公有产权的还是公有产权，原来集体产权的还是集体产权，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包产到户，通过各种各样私人的财富积累，生成了新的私人产权。所以这不矛盾，而且必然会发展成那样。

FT 中文网：最近几年中国社会一种普遍共识是改革停滞了，这与产权有什么关系？是说中国社会的产权的进一步私有化停止了吗？

盛洪：不单是这个问题。现在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当私有产权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很多民营企业做到非常大，数百亿数千亿规模的时候，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些人动用手中的公权力，强行分割民间的私有财富。产权被破坏，这是很多人觉得改革停滞的原因。

FT 中文网：就是说，民营企业家仍然有积累个人财富的自由，但财富的保障成了问题？

盛洪：积累财富可以，但当你把企业做得很大的时候，就会有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对你施压，比如要求获取企业的干股，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企业家拒绝，可能会被罗织出很多罪名，可以是黑社会罪，是非法集资罪，最简单的，官员可以派税务局去查你有没有偷税漏税。因为我手握公权力，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侵夺去恐吓，让你有恐惧之心，这个时候你为了保护自己，只能拿出干股。反过来讲，你拿出干股给他们，能获得一种安全感，因为他也是你的股东了，你可能还能获得别的利益。这个时候，产权已经不纯粹，无法得到保护，从产权理论来讲，政府这个坎就没过去。而在法治国家，私有产权受到严格保护，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理由、更不能滥用公权力去侵夺私有产权。

FT 中文网：所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公权力对私有产权的侵夺？

盛洪：对，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农民的土地。一个城市要发展，靠近城市的土地被政府看中，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向农民强制征地。本来每亩地的市场价值可能是 500 万元，政府给 5 万让农民离开。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这个时候产权实际上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完全是抢夺土地。再比如税收。一个国家的税率是政府收的税占 GDP 的比重，应该在一个恰当的水平，不应该是不断往上涨的。但最近 20 年，中国的税率一路上涨，这是不合理的。税收代表企业和公民购买政府公共物品的价格，类似一种垄断价格，甚至比垄断更厉害，因为它有暴力作为后盾。当你要购买的一种资源、或者一个零部件的成本是不受约束的话，实际上你的产权就受到了侵犯，因为你的收益只能越来越低。

FT 中文网：因此产权理论要发挥作用，前提是有一个法治社会？

盛洪：如果产权可以被随便侵夺，它就不是产权了。反过来讲，产权能受到保护，一定是在法治社会中，而法治社会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约束那些有能力侵夺私权的机构和个人，不能去侵夺。假如一个社会中，政府做什么不受法律或宪法约束的话，就等于没有产权。

FT 中文网：私有产权是怎么从改革初期的被保护、被鼓励，变成今天日益被公权力觊觎和侵夺的？

盛洪：在 80 年代，一方面改革刚开始，人们渐渐富裕，但还没到巨大财富涌流的那种阶段；当时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大多数人也还没有明白怎么能够在市场制度下获得更多的份额。所以在那个阶段，相对来讲，中国的产权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和完整，老百姓一般的产权是得到保护的。

往后的发展中，特殊利益集团开始有两个考虑。第一，它尝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看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如果它可以分一个固定的比例，一定比以前更富，所以它愿意继续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包括产权制度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一般的司法体制是不断向前推进的，假如两个老百姓之间因为产权产生纠纷的话，司法制度的确比过去更完善了，可以尽量维持公正。但当产权纠纷涉及公

权力的时候，在老百姓和政府打官司的一些案例中，司法反而倒退了，因为公权力会出手干预。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约束，比如说每年要花多少钱事实上没有约束，征税也几乎没什么约束——名义上人大是要审查的，但人大什么时候都会通过。中国目前的税收中，只有三项是有法律依据的税收，其他都没有。这个时候，当权者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压力，今天这儿缺点儿钱，明天那儿缺点儿钱，那今天这涨点儿税费，明天那个涨点儿税费，所以可以看到，税收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 GDP 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又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速，收和支都不怎么受约束。说的比较公正一点，并不是说其中的个人有什么恶意，关键在于没有一个硬性的制度约束，所以就不断在涨，实际上就是公权力不断地在侵夺民间的产权。

因此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赞成市场，因为市场经济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计划经济下它也没钱。但另一方面，它又一定要求一种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让它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分割比例——当然它不会直接这么说，它可以称之为党的领导，或者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或者称之为国家宏观调控，都可以。

与此同时，占中国经济很大一块的国有企业也发现，如果把某些行业垄断了，定个垄断高价，可以收获巨大的利益。很多企业家评论说，八九十年代时的国企还不太明白，后来全明白了，市场有这么多钱，我们怎么能在市场上赚更多钱？我要是垄断银行，我就控制存款贷款利率；我要是垄断石油，我控制石油价格，等等。到了 2000 年以后，垄断确实越来越强。在法治国家，竞争是基本原则，垄断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过议会的特殊批准才可以，而我们的垄断都不需要议会批准操作，他们自己批准，我们叫“行政性垄断”。

比垄断更严重的，就是直接侵夺，比如针对一些大型民营企业，还有很多企业家突然就被抓到监狱里，其实就是因为某官员看中了他的资产。这种情况被披露的并不太多，但各个地方都有。

FT 中文网：最近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现象，就是中国政府在国外的“大撒币”，不论是通过无偿援助还是低息贷款的方式。这某种意义上是否也是公权力对私权的一种侵犯？

盛洪：那当然。在一个宪政国家，花钱是要议会批准的。美国特朗普总统本想搞阅兵，突然发现太贵了，那就不搞了，其实大概不到 1 亿美元。中国表面也有一个审批机制，就是人大，但人大可以不向社会报告，比如说奥运会花了多少钱？大家不知道。上合峰会或者 G20 花了多少钱？大家也不知道。

FT 中文网：与此相关的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海外对这一战略也有很多争议，一种主要担忧是，中国会把“公权力干预商业活动”的做法，输出到海外？

盛洪：“一带一路”从商业角度考虑是好事，可以打通商道。但中国政府把它作为一个国际战略，就有问题了，因为最重要的是它要由中国政府来推动，那就难免也会把中国政府的弊端推向全世界。这些弊端有很多，比如项目招标，很难保证公正。我们在国内参加过的所谓竞标，几乎都是事前内定的，这就是一个很糟的东西。再加上，国有企业在人家看来，就是中国政府，因为它不仅是国有，还建

立了党委，还有党委书记，那还能真正遵守自由市场经济的商业规则吗？马哈蒂尔一当选马来西亚新任总理，就宣布暂停前任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项目，因为他怀疑，这些项目对自己的国家是否真的有好处。最近还爆出一些中国人在海外行贿、或者由政府背后支持的网络监控等丑闻。如果属实，这种公权力不受约束的做法向外输出，对世界商业秩序是一种破坏。

FT 中文网：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导致的，但在更深层次上，近几年中国日益明显的国进民退、公权力对私权和市场的侵蚀，让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抱有很深的担忧。比如美方就公开批评“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为什么外界会担心这个计划，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政府举国家之力来提高某些产业竞争力的做法？

盛洪：这个计划名义上要推进中国的科技进步，但我认为它起不到这个作用。这只是一些利益集团为了获取每年 6000 多亿科研基金而打的幌子。中国真正的科技进步靠的不是政府支持，而是两个来源，一是靠民间科研，而民营企业很少能获得科研基金，另一个靠的是国外技术的转移。政府的科研基金其实就是唐僧肉，而在很多时候，申请过程是一个寻租机制，最有创新力的人往往拿不到钱，拿到钱的往往是有关系能拍领导马屁的人。所以这个体系基本没产生真正的科技进步，只是分钱的名义而已。另一个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买国外技术，然后说成是自己的，比如汉芯、最近爆出的红芯丑闻都是这样。所以有人专门就“中国制造 2025”问我时，我的回答就是，美国其实不用在意，这没什么用，因为政府不会把钱给真正的爱因斯坦。

FT 中文网：从产权理论的角度说，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能促进产业发展吗？

盛洪：至少在我们看来，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可能日本通产省的一些官员和一些教授会说产业政策和日本奇迹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但也有很多人会说，日本奇迹完全是企业家干出来的，跟产业政策有什么关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日本曾经要限制汽车制造公司的数量，本田汽车原来就不在名单里，政府说，已经有十几家了，你再进来，就恶性竞争了。本田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它做得最好。产业政策起了反作用。凭什么要阻拦一个企业去生产汽车？凭什么政府比企业家更聪明？

FT 中文网：贸易争端中的另一个焦点，是中国一些关键市场，比如金融市场、石油市场，对外资和民间资本的准入度。在这些领域，您认为中方迫于外界压力做出妥协的可能性大吗？

盛洪：可能性不是很大。国内不开放的市场，很多都是被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牵涉巨大的利益，背后都是权贵利益集团。再比如要取消对国企的政府补贴，我讲的是广义补贴，这些利益集团也几乎不会让步。贸易战之初，刘鹤去到美国，只承诺中国多买些美国产品，而美方提的其它要求，比如取消国企补贴、开放一些重要产业的国内市场、开放互联网等，都没有得到中方的承诺。特朗普团队一开始接受了，我还挺惊讶的，但后来他们很快发现了问题，又反悔了，我觉得才是正常的。

这个利益集团很顽固，但是美国的压力也还在持续。起码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次贸易战，连中国国内的舆论他们都没赢。中国国内知识分子没有明显支持政府，草根阶级也没多少人出来支持。这

是因为权贵集团对老百姓的利益有很多侵害，不许人家这，不许人家那。

FT 中文网：公权对私权的不断侵夺，会不会出现一个所谓 tipping point，一个转折点，一旦越过，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盛洪：对这个问题，我最近的想法比过去悲观了。我们确实已经接近一个转折点，这之后就是经济崩塌。逻辑很简单，公权不受约束，老在不断地分割更大的利益，这是有一个上限的，上限就是别人都活不下去了。比如说税率。中国的企业税率已经高到企业已经没有利润空间了。我辛辛苦苦做企业，交完税就赚不到钱，那我为什么还要辛苦？把钱带出去算了。这个结果就是，比较多的人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是同时的、大量从市场退出。这就是经济崩塌的过程。

而当局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一是因为，它这些年一直在往上提税率，越来越形成惯性。第二是因为舆论控制，这使得它不知道危险将近，就是盲人瞎马地干。这个国家没有一个真实信息的渠道。结果就是经济崩塌，甚至社会动荡。

要防止经济崩塌，需要出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这个人需要比邓小平更具智慧。第一他要能够完全协调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化、宪政民主这套话语。这一点邓小平完全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他根本没有约束。第二，他能对抗强大的利益集团。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么一个人。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特殊利益集团中有一些有长远眼光的人，他们意识到坚持他们自己的集团利益会毁掉中国经济，也就毁掉了他们自己，从而愿意进行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自身长远利益的改革。

经济崩塌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能否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很难说。改变谈何容易，中国人没有准备，老百姓没有真正的民主的自治传统和契约精神，而像汉娜·阿里伦特说的那样，民主是需要这种基础的，不然就是乌合之众。

当然也不是完全悲观。市场经济发展很多年，这些年对社会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民主培训，那就是公司。一家公司就是一个微型的宪政民主体制，要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股东大会选举出来的理事会，董事长，经理层。也不要低估了在农村实行很多年的村民自治。村里的选举现在也不能完全被上级操纵或不遵守规则，大家越来越比较认真的去按照规则去运作。

FT 中文网：回到产权理论与中国改革。如何让产权理论引导中国改革突破阻滞，继续推进？

盛洪：现在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约束权力。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根子就在公权力不受约束，产权的所有的威胁来自于公权力，核心在这里。来自私权的威胁不重要也不大，你的东西被别的老百姓抢夺的几率很低，而且你有办法去对抗它。但是面对公权就没办法。所以这肯定是最危险的，而且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事情。 ■■

[【返回目录】](#)

肖雪慧：离谱的焦点偏移

[肖雪慧 著名伦理学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首发于作者新浪博客；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肖雪慧教授

—

万州车祸发生后，最该追责的方面，未见有多少人发声，对车上除肇事者外 13 位罹难乘客的责难却蜂拥而至。认定死者都有责任，据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就雪崩时每片雪花皆有责论，笔者写了下面帖子：

【雪花雪崩的文学化比喻不了人类社会、国家的问题，倒偏移、失焦，转移了真问题】当人为灾难发生，有人喜欢用诸如“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来解释，于是“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的貌似深刻的说法就成了流行论断。然而，社会、国家的问题，不是雪花雪崩的文学化比喻能表述的。雪花，没有意识，无意识则无责任。用没有意识，更无意志参与的自然现象来比喻人类社会，有时不仅说明不了问题，而且偏移、失焦，转移了真问题。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跟自然现象没有可比性。J- Q 国家除了强化恶制度的首恶集团、依附其上主动作恶、被迫作恶、顺势的、搭便车的……，还有进行各种抗争、有不计代价为他人争取权益的人，他们也是加害者？有些貌似深刻反省的说法，其实在平摊责任中稀释主恶之罪。

这次客车冲垮护栏掉进江里的惨剧，用雪花雪崩的文学化比喻同样不得要领。事件有很多方面需要反思、需要追责：护栏质量、对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上乘客与司乘人员的行为缺乏明确规范和有效实施手段——别忘了，这是这样一个国度，国民在网上说了什么马上就会面临无妄之灾，在真正事关公共安全的问题上却懒政……等等。至于掉进江里那一车人，除了撒泼恶妇、不理智的司机，持雪花雪崩

的了解事件完整经过吗？如果不了解，怎么就能断言所有乘客都是冷漠看客而个个都有责任，对遭遇横死的死者再来一番道德挞伐？

二

昨日自媒体充斥对死者更多责难。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乘客要为自己的死负责”、“那车坐了一堆‘死人’”……还有人发帖指车上人无信仰，“在万州坠江公交车上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的话，就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见此说，啼笑皆非，在基督徒占国民比例很高的美国，学校、教堂、超市……发生多人死伤的枪击案不少见，写和传这种帖子的人确信发生这些惨剧场合没有一个基督徒？



重庆 10 月 28 日发生惨烈车祸，乘客与司机打斗致公交车坠江

很多抖机灵的“格言”帖子也频频推出：“你不为正义站起来，你就得为邪恶陪葬。集体沉默，就是集体沉没。”“最大悲剧，不是坏人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马丁·尼莫拉牧师那段名言也被改装后指向坠江客车中 13 位乘客：“起初他们在高铁上闹事，抢占别人座位，我没有说话，因为没占我的座位；接着他们碰瓷……最后他们在行驶的公交车上殴打司机，而我在车上……”

对死难乘客的所有这些指责，都一口咬定乘客冷漠、沉默。我觉得，指乘客冷漠、沉默的人，恐怕很多不坐或很少坐公交车，指责充满想象。我经常坐公交车，时不时会遇到有人争吵、撒野，但每次都会有人劝解或制止，不一定出于道德感、抱不平，仅仅因为很少人能忍受众多人共处一个狭小封闭空间内的争吵、喧哗，也会发声制止。而万州坠江客车上，警方公布的视频只有刘某开打、司机单手还击、最后坠落江中那几秒钟，之前 5 分钟争吵视频谁也没看见，责难者就发挥想象力把乘客设定为沉默的一群。

三

再回过头看事发过程，据腾讯新闻：由于道路维修改道，22路公交车不再行经壹号家居馆站。当车行至南滨公园站时，驾驶员冉某提醒到壹号家居馆的乘客在此站下车，刘某未下车。当车继续行驶途中，刘某发现车辆已过自己的目的地站，要求下车，但该处无公交车站，驾驶员冉某未停车。10时3分32秒，刘某从座位起身走到正在驾驶的冉某右后侧，靠在冉某旁边的扶手立柱上指责冉某，冉某多次转头与刘某解释、争吵，双方争执逐步升级，并相互有攻击性语言。10时8分49秒，当车行驶至万州长江二桥距南桥头348米处时，刘某右手持手机击向冉某头部右侧，10时8分50秒，冉某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侧身挥拳击中刘某颈部。随后，刘某再次用手机击打冉某肩部，冉某用右手格挡并抓住刘某右上臂。10时8分51秒，冉某收回右手并用右手往左侧急打方向（车辆时速为51公里），导致车辆失控向左偏离越过中心实线，与对向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车辆时速为58公里）相撞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

这段叙述中基本情节很清晰：（1）道路改道，刘某该在另处下车，司机履行了告知义务，她没下车。（2）她要求下车时已无公交车站，司机拒停。（3）10点32分刘从座位走到司机右侧指责，司机解释、争吵……这个过程有5分钟。（4）接下来是致命几秒钟：10点8分49秒、50秒、51秒。整个过程，警方公布的只是最后几秒视频，那五分钟没有公布，不能凭想象就认定他们是沉默的一群。

最后致命几秒钟，不在车上的人事后说乘客可以制止悲剧发生的，其实把乘客预设成能把握整个事态演变过程并能以自己行为改变悲剧性事态却放弃行动的人。多了事后诸葛亮的想当然，少了对快速行驶车上的乘客在几秒钟突发状态下能做什么的设身处地。

这辆快速行驶的长途公交车，从周某用手机打司机头、到车辆失控且与迎面而来的小轿车相撞、坠江，仅几秒钟。其他人恐怕还没反应过来。即使有人想制止，还看有没有能力。13人中有4人是带小孩的一家子，其他9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有无快速反应能力，我们一无所知。对这些死者，保持一份对尊重为好。

四

其实，对乘客能做什么而没做什么的讨论，是失焦的讨论。

乘客对司机的攻击早已发生过很多起，却没有对这种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行为作处理。这样情况下，与其说“最大悲剧，不是坏人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毋宁说“最大悲剧是对坏人嚣张的制度性纵容”！而雪崩雪花有责论、底层互掐论，都撇开了最该被追责方的责任。 ■

2018-11-4

[【返回目录】](#)

王国乡：中美贸易冲突发生的国际货币制度根源与治理对策

[王国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本文作者王国乡教授

内容提要：国际贸易的功能在于通过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现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比较利益。而实现比较利益的必要条件，一是要有一种国际货币作为国际商品交换的计价尺度、流通手段和储备手段（作为支付或清偿手段）；二是以国际货币计价的国际贸易收支必须保持基本平衡。然而现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的运行机制，却是通过美国的持续贸易逆差及其贸易伙伴国的持续贸易顺差来实现的。这种国际货币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的矛盾，是引发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本原因。本文研究的主旨在于揭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货币发行国，出现持续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现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中存在两大难题，即“国际收支失衡难题”（新特里芬难题）和“国际储备膨胀难题”，并据此提出了一个以实行“国际储备限额管理”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方案，以期为消弭国际贸易争端提供一种全球性共识。

关键词：国际信用货币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 牙买加体系 良币驱逐劣币 国际收支失衡难题 新特里芬难题 外汇储备膨胀难题 边际分析方法 比较利益与边际比较利益 平均购买力平价与边际购买力平价 市场均衡汇率调节 国际贸易经济效益极大化条件 国际储备限额管理

一、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特征

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制度自发进入浮动汇率时代（牙买加体系），这就是本文所说的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牙买加体系与布雷顿体系相比，其唯一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主权国家对内发行的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而其不同点则表现为牙买加体系所具有的以下四个特

征：

1、国际货币信用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上流通的国际货币（美元），虽然也是主权国家（美国）对内发行的信用货币，且对内不能兑换黄金，但其在国际流通中却是与黄金挂钩的，也就是由黄金保值的，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可以按每盎司 35 美元的官定价格兑换黄金。而在牙买加体系下，包括美元在内的所有国际货币都与黄金脱钩，其它非货币发行国持有的国际货币不能向货币发行国兑换黄金。这就使现行国际货币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

2、国际货币多元化

从原则上说，在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任何一个国家对内发行的信用货币，只要在国际商品交换中能被其他国家信任和接受，都可以履行世界货币（国际货币）职能。但在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信用货币在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时，才能称为国际货币。同时由于信用货币制度中存在着“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从而只有其币值相对最为稳定，并得到其他国家普遍信任的货币，才能真正成为世界货币。美元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货币。因此现代国际货币制度被称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其他发达国家发行的国际货币，从本质上说，只是美元代用券，其国际信誉是靠增加美元储备，并实行本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来保证的。

3、汇率自由浮动。

汇率浮动的形式是由国际货币使用国政府自主决定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本币与美元（或其它国际货币）的自由兑换形成自由浮动的市场汇率。另一种是通过强制结汇和制定固定汇率，形成一种有管理的（可调整的）盯住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制度就是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4、各国持有的国际货币储备量无最高限额。

在牙买加体系下，由于国际货币储备量不受黄金储备量的限制，因而，国际货币储备量具有无限膨胀的可能性。

二、现代国际货币制度的两大难题——国际收支失衡难题与国际储备膨胀难题

1、国际收支失衡难题（新特里芬难题）

美元作为主权国家的信用货币来充当世界货币，必然出现如下两难困境：如果美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虽然有利于提高美元的信誉，但却会使其他国家不可能获得美元储备，从而失去国际清偿能力，不利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反之，如果美国无限满足其他国家的国际储备需要，则必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当逆差超出一定限度时，将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降低美元的国际信誉，并导致国际金融风险和债务危机。

2、外汇储备膨胀难题

这一难题是指，在存在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必然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前提下，由于下列货币制度缺陷，而使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加大，即国际货币（外汇）储备量无限膨胀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波动会引起国际金融风险与投机，由此促使国际货币使用国为抵御金融风险而尽可能多的增加美元储备。

其二，在国际货币多元化和国际储备缺失限额管理的条件下，有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为了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借以获得货币对外输出的红利（铸币税），而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如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和补贴等）增加净出口和美元储备，并以美元为锚发行本国货币，借以提高本币对外输出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

其三、从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来说，为了取得更多的对外货币发行红利，也更愿意对外增加货币供给，以满足各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需要。

由此可以说，在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出现“外汇储备膨胀难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

下面的数据可以证实上述判断的正确性。

1971 年，美国 GDP 为 1063 亿美元，外债（全球美元外汇储备）为 533 亿美元，占 GDP 的 5%

2017 年美国 GDP 为 19.3868 万亿美元，全球美元外汇储备为 7.1736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37%。

数据表明，2017 年全球美元外汇储备占 GDP 的比重，比布雷顿体系时期的 1971 年的占比膨胀了 7.4 倍。

三、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是引发中美贸易争端的关键因素

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一国的贸易逆差，就是另一个贸易伙伴国的顺差。因此，在上述两个难题的共同作用下，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¹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使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货币发行国，成为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和债务国，并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增加，引发国际债务危机和金融风险等弊端；也是使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货币使用国，成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债权国，并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扭曲，某些部门产能过剩，消费增长缓慢，收入两极分化等弊端。这是引发中美贸易冲突的主要原因。

根据美方的表述，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的主要理由是，自布什政府以始，美国已经积累了超过 12 万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仅 2017 年就有 8000 亿美元逆差。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

¹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贸易收支只是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收支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说，不能把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混为一谈。但在中美贸易争端中，人们总是把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贸易收支在数量上是国际收支的最大部分，在质量上也是影响国家利益的主要因素。本文讨论的主题，既涉及国际货币制度中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又涉及中美贸易冲突中贸易收支失衡问题。因此，交互使用这两个词语是不可避免的。读者只要理解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就能理解它的含义。

差（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累计达到 4.7 万亿美元，仅去年就达到 3755 亿美元，几乎占到去年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半。由此导致美国失去 5.5 万多家工厂，600 万个制造岗位，且债台高筑。截至 2017 年 7 月 3 日，美国政府债务总额为 19.8 万亿美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04%，其中对外债务约 6-7 万亿美元。据此，特朗普认为，这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战略安全，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美国政府宣称“不能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基于这种认知，美方在中美谈判中，以增加进口关税相威胁，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减少 200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继而又提出“三零二停一允许”的贸易规则，要求中方接受。但是由于中美对贸易争端产生的原因和解决之道的认知不同，至今没有达成协议。

中美双方在贸易争端问题上的不同认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在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及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的支持下，特朗普深信，全球化使众多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来自中国、墨西哥等国的廉价商品造成了巨大的贸易赤字，损害了美国经济。

纳瓦罗的论点核心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中国等国家强加的高关税，货币操纵，知识产权盗窃，血汗工厂劳动力和松懈的环境控制等因素推动的。（网文《美名记曝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内情》）

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向特朗普反复说明，美国经济如今以服务业为主，不应该按几十年前的观念，强行用征税等手段把制造业留在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

科恩相信贸易逆差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可能是一件好事，让美国人购买更便宜的商品……这就是全球市场的效率所在。（同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从根本上说不是赤字，而是盈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来自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愿持有美元。这是美国经济成功的信号。”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美国不能一个帽子扣下来就说中国是经济侵略者，导致这些问题有中国的因素，也有美国的因素，美元是结算货币，美元输出换回了商品，中国何罪之有？美国市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美国企业才来采购，所以才有贸易逆差，怎么能是中国的错误呢？（网文）

林兆木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宏观分析》（见人民日报）一文中认为：美国数十年来保持巨额贸易逆差，显然不是被迫之举，而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好处。美元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决定了美国可以借助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一方面源源不断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另一方面通过美元回流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大量廉价资金……如此看来，贸易逆差不仅没让美国吃亏，反而让美国占了大便宜。

以上五位中美精英人士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评论，虽然都集中讨论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但其利弊评价和政策选择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其中不仅凸显中美贸易争端，还凸显中美两国

² 转引自李长久《美国债务危机的影响与对应之策》，见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 2011 年年会《论文集》p60

内部的是非之争。在美国内部存在着以科恩和弗里德曼为代表“贸易逆差有益论”，与以川普和纳瓦罗为代表的“贸易逆差有害论”的激烈争论。作为执政党领袖的川普把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贸易政策，而只字不提美元对外发行机制对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中国内部对于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以陈文玲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是国际自由贸易（企业自由选择）产生的结果，双方都有责任，不能归咎于中国。而以林兆木为代表的“还击派”却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是美国利用美元对外发行的特殊地位沾了中国的大便宜，并且在美国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顺差时，更认为是美国想要沾中国的更大便宜。

总之，在中美贸易争端中，不论是官方或民间精英人士，就笔者接触到的文献看，还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论及，现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中美贸易争端或冲突的根本原因问题。有鉴于此，我在前文提出的国际货币制度的两大难题，就是试图找到中美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共识。

四、国际货币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冲突——国际收支平衡是实现国际贸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上文分析表明，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中的“两大难题”是导致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而本节阐明的国际贸易原理，则在于证明国际收支平衡是实现国际贸易经济效益极大化的必要条件。

我在 1982 年出版的《对外贸易与汇价决策新论》³一书中，提出的对外贸易理论——边际比较利益学说，和汇率决定理论——边际购买力平价学说，就是采用边际分析方法证明，不同商品的国内外价格比率的差异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比较利益的标志；外贸企业以利润为目标，以商品价格比率的差异为依据，所作出的商品进出口方向和数量的选择，在均衡汇率调节下，将能保证在实现外汇收支基本平衡的基础上，促进客观存在的比较利益转化为外贸经济效益，并保证对外贸易的社会总效益（总利润）趋于极大值。⁴

下文我将用一个极其简化的分析模型，来说明这本书提出的国际经济学原理的要义。

1、不同商品价格比率的差异形成比较利益，并决定商品进出口方向的规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可贸易商品都有一个本币价格（¥）和相应的外币价格（\$），每一种商品的国内外价格比率（又称相对价格，标记为¥x/\$1），是该商品在本国市场稀缺程度的标志。

假定一国可贸易商品只有 A、B 两种，其国内市场价格分别为 24 元和 48 元，其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分别为 6 美元和 4 美元，据以计算的价格比率分别是：

$$A \text{ 商品价格比率} = ¥24/\$6 = ¥4/\$1$$

³ 《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199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⁴ 我在 1985 年发表的论文《汇率决策的最优原则》一文（分别《在经济学动态》1985 年 1 月和《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5 年第二期发表），是从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出发提出汇率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即外汇收支供求平衡原则、单一汇率原则和有管理的浮动原则，这三个原则后来成为 1994 年中国汇率体制改革的理论根据，即以市场供求平衡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原则。这一研究结果也成为《新论》一书的理论基础。

$$B \text{ 商品价格比率} = ¥48/\$4 =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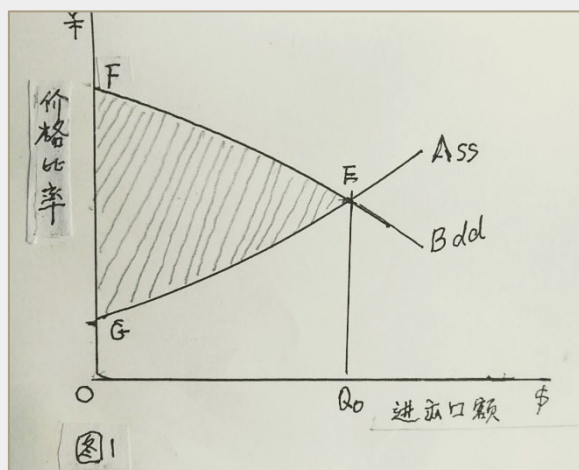
由此可知，A 商品的价格比率小于 B 商品的价格比率，即 A 的稀缺程度小于 B 的稀缺程度。其价格比率的差异为 $¥8/\$1$ ，这就是 A 与 B 两种商品之间存在比较利益的标志。

这样，在不考虑汇率调节作用时，以盈利为目标的外贸企业（下称经济人），选择商品进出口方向的规律是：只有出口价格比率较低的 A 商品，进口价格比率较高的 B 商品，且进出口外币额相等，才能实现比较利益，从而获得外贸盈利。据此，经济人出口 A 商品 1000 美元，其收购成本为人民币 4000 元，进口 B 商品 1000 美元，其在国内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12000 元，在假定进出口费用为 0 的条件下，就能实现比较利益，即增加盈利 8000 元人民币。如果进出口方向相反，则亏损 8000 元。

上述 8000 元人民币盈利是以进出口外币额（外汇收支）平衡为条件的。如果进出口额不相等，不论是顺差或逆差，则只能形成对外债权或债务，而不能实现比较利益，即不能增加外贸盈利。

2、边际价格比率的变动决定商品进出口数量的规律

在上述假定条件下，既然出口价格比率较低的 A 商品可以获利，出口商就会继续增加出口量，借以增加边际（新增）利润。但是增加出口会引起 A 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上升，国外市场价格下跌，从而引起边际（新增）出口价格比率上升，边际利润减少。如此连续等额增加出口量，就会形成一个随出口量增加而依次增加的边际出口价格比率递增数列。将这个数列画在一个平面坐标上，见图 1，就会显示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 A 商品的出口曲线 A_{ss} 。图 1 平面坐标的横轴标示的进出口量是以美元为单位（个、十、百、千、万。。。等任选单位）的进出口额。纵轴标示的是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比率，实际上就是每进出口一定单位美元所对应的人民币数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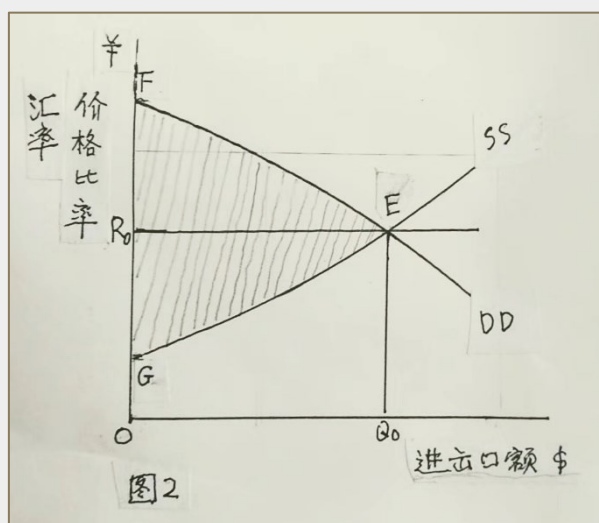
同理，连续增加 B 商品的进口量，就会引起国内市场价格下跌，国外市场价格上升，从而引起边际进口价格比率下降，边际利润减少。由此形成一个随进口量增加而依次降低的边际进口价格比率递减数列，并在图 1 中显示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 B 商品的进口曲线 B_{dd} 。

两条曲线的交点 e 表示两种进出口商品的边际价格比率相等，其边际利润为 0，总利润达极大值（见图 1 密集斜线标示的面积），并决定 A、B 两种商品的最优进出口数量（美元额）为 OQ_0 。

2、根据 Ass 和 Bdd 曲线推导总出口曲线和总进口曲线及其决定市场均衡汇率的规律

根据 Ass 单一商品的出口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表示边际出口价格比率递增）的性质，可以推导出每一种商品的出口曲线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将所有可贸易商品的出口曲线上的，对应于每一个边际价格比率的出口额分别加总，便会形成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总出口曲线 SS，见图 2，它表示出口商品的边际价格比率随美元出口总额的增加而依次递增的性质。

同理，我们也可以将每种商品的进口曲线 Bdd 上的，对应于每一个边际价格比率的进口额加总，而形成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总进口曲线 DD，见图 2，它表示进口商品的边际价格比率随美元进口总额的增加而依次递减的性质。



SS 曲线与 DD 曲线相交于 E 点，在此点边际出口价格比率=边际进口价格比率，边际利润=0，总利润达极大值。见图 2 斜线标示的面积。

从国际金融学的角度来看，出口曲线与进口曲线也分别是外汇供给曲线与外汇需求曲线。这是因为，出口商将出口商品所收入的外汇在国内外汇市场出售，就形成外汇供给。进口商为了从国外进口商品需要用人民币兑换外汇，就形成外汇需求。因此，图 2 中的 E 点就是外汇收支平衡点，由此点决定的汇率就是市场均衡汇率。

4、利润目标、市场价格比率、市场均衡汇率，共同决定对外贸易的社会总利润趋于极大值的规律

在经济实践中，外贸商品有成千上万种，进出口什么和进出口多少，都是由众多外贸企业分散决策进行的。那么，在这种分散决策中，会不会出现商品进出口方向倒置，外汇收支失衡，外贸经济效益下降的混乱现象呢？

我的回答是，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假定交易费用为 0 和没有税收、补贴以及没有其他行政干预的情况下，上述混乱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因为，外汇汇率的实质是美元作为外贸商品交换的媒介和一般等价物的价格，其表现形式为一美元兑换若干人民币的价格比率，即汇率=¥x/\$1。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外汇汇率是由外汇供求平衡条件——边际进口价格比率=边际出口价格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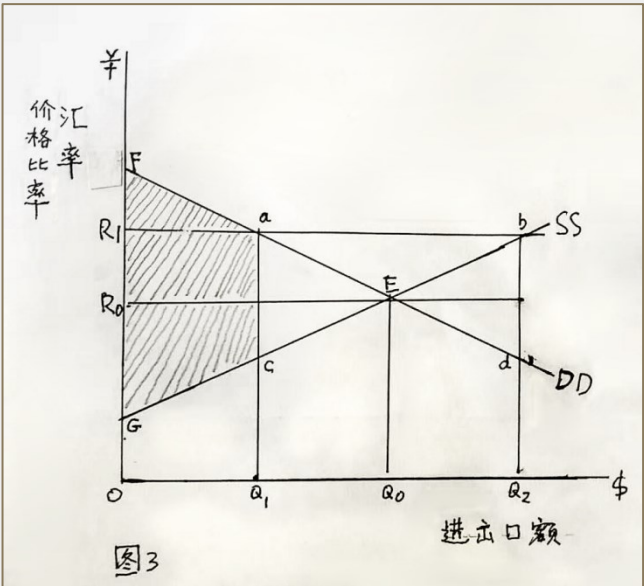
决定的。在外贸经营中，对于出口商来说，汇率是出口商的售汇收益，因此，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出口商所选择的出口额，只达到边际价格比率等于汇率为止，这是出口商利润最大化的边际界限。对于进口商来说，汇率是进口商的购汇成本，因此，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进口商所选择的进口额，只达到边际价格比率等于汇率为止，这是进口商利润最大化的边际界限。这两个边际界限就保证了进出口外币额必然平衡且进出口利润达极大值。

所以说，利润目标和均衡汇率调节是保证外贸秩序良性运行必要前提。这一国际经济学原理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还可以用图 2 来说明。

图中 OFEQ0 的积分面积是进口商进口商品在国内出售的人民币总收益，其中汇率线以下的面积是购汇总成本，汇率线以上的面积是进口总利润。图中 OR0EQ0 的面积是出口商售出外汇所得的人民币总收益，其中出口曲线以下的面积是出口商收购出口商品付出的人民币总成本，出口曲线以上、汇率线以下的面积是出口总利润。出口总利润与进口总利润之和就是外贸总利润，如密集斜线标示的面积。这就是用数理经济学的逻辑方法证明，外贸经济效益（总利润）极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外汇收支平衡。

5、外汇汇率偏高形成外贸顺差并减少外贸盈利的必然性

如图 3 所示，假定外汇汇率高于均衡汇率达到 R1 的水平，则在国内外物价不变从而价格比率曲线不变的条件下，将使进口额减少到 OQ1 的数量，出口额增加到 OQ2 的数量。其中 OQ1 的出口量是和对应的进口量相等的部分，故仍能创造外贸盈利为人民币 GFac 的面积，比图 1 减少了 cEa 的面积。



但是其中 Q1Q2 的外币出口额，由于只有出口而没有进口，所以，除了没有创造外贸盈利外，还造成双倍的外贸顺差出口额（即 Q1Q2 出口美元额线段的两倍），以及造成对应的双倍人民币财富流失（即 Q1abQ2 标示的人民币出口面积的两倍）。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图 3 的横轴，既表示美元出口额，也表示美元进口额，因此在图中表示的顺

差人民币出口面积 $Q1abQ2$ ，既包括原来出口曲线上的 cb 线段以下人民币出口成本面积和 cb 线段以上的出口商盈利面积，又包括原来进口曲线上的 ad 线段以下的人民币出口成本面积和 ad 线段以上出口商盈利面积。

这里之所以把顺差中的出口商的收购成本和盈利都看作是国民财富的外流，是因为在没有相应进口的条件下，出口商卖出外汇所得到的人民币收入，并非来自进口商品的销售收入，而是来自于财政支出。而国家财政支出是其他生产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的转移支付。

在此，也许有读者会问：国家收购外汇的支出是一种等价交换，在这种顺差性出口中，固然有以人民币表示的中国财富的流出，但却有等额的外汇流入，怎么会说外贸顺差是国民财富的流失呢？

我的回答是：1) 所谓外汇收入不过是中国外汇银行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账户上增加的一笔美元存款，在这笔资金未提用之前，它就是增加了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其实质就是中国财政用其它部门（非外贸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购买的美元，以低利息报酬存放于美国金融体系，并成为美国人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资金来源。这显然是中国国民收入作为资本的外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国对中国征收的“铸币税”，我称之为美元对外发行红利。2) 如果在之后的某个时间内，中国将这部分外汇存款提取出来，再用于对美国或其它国家的逆差性进口，形成了等额的国民财富单向流入，则会形成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利益收入（外贸盈利），并同时减少等额外汇储备。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节分析的意义，见图 3，我将我国 2017 年的贸易收支，通过“四舍五入”的方法，假定其出口总额为 5000 亿美元，进口为 1000 亿美元（实为 1300 亿），贸易顺差为 4000 亿美元（实为 3755 亿），同时假定汇率为 $R1$ ，由其决定的可以实现比较利益的进出口额分别为 1000 亿美元，贸易顺差为 4000 亿美元（ $Q1Q2$ 的两倍）。据此可以推导出，在价格比率不变的条件下，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应当为 $Q0$ ，由其决定的最优进出口平衡额分别为 2000 亿美元。

或有读者质疑曰：我国人民币汇率未必低估，甚至可能高估。在川普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后，曾引起人民币贬值（外汇汇率上升）的事实，就表明之前人民币汇率没有低估，而是高估了。由此是否可以说，你的分析模型未必能说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问题？

对此，我的回答是：1) 在人民币没有对内实行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人民币到底是高估或是低估，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搁置不论。2) 在国际金融学中，人们把外汇管制下的汇率区分为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指官方宣布的汇率。实际汇率是指在物价上涨、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的共同作用下，已经促使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比率普遍上升，并产生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的显著效应，而官定汇率仍然没有作出相应调整的条件下形成的汇率错位安排，一般称为本币实际汇率低估（即外币实际汇率高估）。据此可以说，本文提出的分析模型，即使不能适用于名义汇率调节下的外汇收支分析，也能适用于实际汇率调节下的外汇收支分析。

到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国际贸易经济效益最大化必须通过国际收支平衡来实现的运行机制，与现

行国际货币制度中，货币发行国提供国际储备手段，必须通过国际收支失衡来实现的运行机制，是相互矛盾的。这是导致中美贸易冲突乃至全球贸易冲突的根本原因。因此，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就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当务之急。

五、改善现行国际货币制度是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先决条件

我在 2012 年发表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优原则及设想》一文，⁵是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的思考。这里所讨论的“改善现行国际货币制度”问题，仅仅是为了解决目前中美贸易争端问题进行的短期思考。这一思考的要点就是在保持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国际货币储备限额管理”机制，借以解决前文论及的“国际收支失衡难题”和“国际储备无限膨胀难题”。概而言之，这一管理机制应当包括以下原则：

1) 将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中国际货币储备的职能限定于国际货币使用国满足国际支付需要（即国际清偿力需要）的唯一用途。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国际货币储备额，只要达到当年进口额的 25%，就被认为是具有国际清偿力的标志。这个比例本来是一个最低限额，现在将其定为最高限额也是合理的。

2) 要求所有国际货币储备国都必须实行本币与储备货币的自由兑换。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其一，保证形成反映市场外汇供求平衡的均衡汇率，自动调节市场外汇的供求平衡，避免产生超额外汇储备需求，有利于实现外汇储备的限额管理。其二，市场汇率的变动能够灵敏地反映国内货币发行量和物价的变动，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保持币值稳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3) 要求所有国际货币储备国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制度，调节短期汇率的稳定。并由此形成国际收支平衡新概念，即外汇收支平衡的含义，包括国家对国际支付手段的合规需求（限于当年进口额的 25%）与供给在内的外汇收支供求平衡。

4) 要求所有国际货币储备国实行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与市场汇率自由浮动相结合的制度。这将更有效的保证市场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央行基准利率约束下保持稳定。同时有利于各国中央银行把基准利率与基准利率相结合共同发挥宏观经济调控作用。

5) 要求所有国际货币储备国建立远期外汇交易市场，借以形成利率平价机制，防止短期外汇投机活动。

6) 适度扩大特别提款权的额度，借以减少货币发行国贸易赤字的压力。

7) 健全国际货币多元化的良性竞争机制。在国际储备限额管理条件下，任何国际货币发行国，都

⁵ 见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2 年第七期，其中有大量删节。原文 18000 字，只发表 3000 字。此文是根据我在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 2011 年年会暨国际金融研讨会发表的演讲整理而成。（此发言在年会会刊上有摘要发表）其中被删节的部分，包含本文的部分内容。当时尚未发生中美贸易冲突，所以我在当时提出的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两难”问题，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的影响及发生贸易冲突可能性分析，并未引起《经济要参》编辑的重视，而被删节了。现在我写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六年那篇文章的思想来讨论已经发生的中美贸易冲突问题的结果。《要参》中提出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方案是用扩大特别提款权的方式来解决国际货币制度中的“两难”问题。

将不可能通过用增加美元储备的办法，来提高本国货币的信用度，借以扩大本国货币输出量；而只能通过提高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性和国家经济实力与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办法，来提高本国货币的信用度和国际地位。这将有利于形成多种国际货币之间的良性竞争机制。

8) 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地位，切实担当起国际储备限额管理的职能。如果在实行国际储备限额管理之后，在美国作为最大的国际货币发行国仍然存在国际收支逆差压力的条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成员国协商同意的条件下，适度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额度，以减少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

上述八项原则的实施，必将消除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两难”困境，从而为解决国际贸易冲突问题提供一种最优化的国际货币制度环境。

王国乡 2018.10.21.定稿于北京望京花园

附录：

本文阐述的均衡汇率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发表的一系列国际金融论著中，已经作了系统的表述。其中代表作主要有：

《试论汇率决策的最优原则》（《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1期，摘要稿）

《汇率决策的最优原则》（《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5年第2期）

《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研究对外贸易与汇率决定的最优原则》（《金融研究》1986年第七期）

《均衡汇率决定原理》（《世界经济》1986年第五期）

《比较利益原理与利用外资决策》（《国际金融研究》1991年第7期？）

《对外贸易与汇价决策新论》专著《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

《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

《国际金融简明教程》求实出版社 1989年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年2月 

[【返回目录】](#)

辛允星：为“死磕精神”点赞

[辛允星 社会学博士，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本文转载自 2018-10-01 维观天下 微信公众号]



本文作者辛允星

近几年，伴随社会纠纷的日益增加，“死磕”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它指的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些）人或者某件（些）事情斗争到底，努力实现自己所认定的“正当性”诉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当下中国，“死磕律师”可以被看作是此类社会行动的典型实践者。鉴于不同案例的“具体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死磕”现象，我不想做太多的评论；但我要明确表态支持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的“死磕精神”，为它点赞。

如何来理解“死磕精神”呢？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价值观，它坚守社会的明规则，反对潜规则；它坚持讲清道理，反对混淆是非；它捍卫法律底线，反对徇私枉法；它主张曲直明辨，反对难得糊涂；它甘愿为真理而斗争，反对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因此，那些利用无理纠缠手段获取“非正当利益”的行为，及各色的诡辩与狡辩不在本文所讨论的“死磕精神”覆盖范畴内，这里所提出的“死磕精神”是一个典型的正面词汇。

为“死磕精神”点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痛心地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乃至整体的社会进步遭遇到了—种“文化传统”的强力阻碍，这种文化传统的典型表现是：中国人大多都不喜欢凡事“较真”的人，更是讨厌“死磕”，认为它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难得糊涂才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基本方式；同时，人们还普遍缺乏—种明晰化的规则意识和“明辨是非”的强烈欲望，却习惯于“—个巴掌拍不响”的思维方式。

关于这种文化传统在大众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范忠信等所著《情理法与中国人》—书进行过系统讲述。本书研究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伦理“优先于”法律条文，面对社会纠纷，官府通常

寄希望于道德说教，而逃避对其中是非曲直的仔细辨析，官员习惯运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方式调解矛盾，将帮助人们打官司的专业人士诬称为“讼棍”，并进行严厉的处罚。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观点，我们可以从本书中摘举几个典型案例。

故事 1：西汉时期，冯翊太守韩延寿接到一桩“兄弟争夺田产”的诉讼，在未进行案情审理的情况下，他却公开谴责自己在“教化民德”方面的过失，表示要辞官归田，然后闭门思过。看到太守大人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毫不推卸责任，下级官员感觉羞愧难当，表示自己也应该接受惩罚，反思工作中的失误。当地百姓看到这种情形，也非常感动，纷纷谴责争夺田产的两兄弟，使得他们非常后悔，主动表示愿意互让田产，从此以后不再打官司。

故事 2：清朝光绪年间，顺天府宝坻县衙接到一件案子，一位寡妇控告已故丈夫的哥哥与之争夺田地。知县不做任何审问，直接劝令其兄“量力资助”，同时让寡妇写下了“永不滋扰”的保证书；几个月后，寡妇又抢割兄长家的庄稼，这位兄长诉至官府，知县再次令他义助弟媳，他只好继续给予她经济接济，并帮其置买了几亩地；但不久后，她又到兄长门前寻恤滋事，官府则再一次不问细节情由，含糊其辞地责令双方以后应“互不滋扰”。

故事 3：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樊增祥的知县，接到一桩诉讼案件，原告指控一家当铺侵占其三百两银子，却没有任何证据，被告对此给予坚决否认，虽然其所提供的账簿凭证也有“疑窦”，但毕竟还算有所依据。经过一番审问，在毫无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樊知县最后判决责令被告给原告一百两银子，以化解双方之间的争执；而他所依据的所谓“情节”竟然是：原告贫穷，被告富裕，且在诉讼过程当中，原告的态度较好，被告的态度较差。

针对以上案例反映的社会现象，本书认为：这正是中国“无讼”、“贱讼”、“息讼”文化传统的生动展现；这种文化无非是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个人权益，以笼统与空泛的社会伦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要有利害得失的计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必然会出现大量胆小怕事、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争利益、不敢诉讼的良民与顺民，哪怕是遭受官僚权贵的欺凌也不敢进行抗争。显然，这些民众的存在是传统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社会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难得糊涂”、“是非不辨”泛道德主义文化传统，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社会运行的“丛林法则”，面对强者对弱者的欺压，强者视为天经地义，弱者则产生啊 Q 精神，二者构成一对天然的权力“合谋”与互补关系。显然，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最强大阻力，而“死磕精神”则可以成为治疗这种“文化病”的一副良药，甚至可以视为破除这种文化传统的最佳突破口。

其次，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死磕精神”还有利于引导中国人树立现代个人权利观念。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人的个体权利意识觉醒与他们具有强烈的“死磕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西方法治文化传统本身就是其国民善于“死磕”的结果。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没有给“死磕精

神”留下任何余地，所以现在亟需“补课”；通过这种精神的发扬，激发中国人形成更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从而为法治文化的培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死磕精神”是社会潜规则的克星，是各种权力腐败的天敌。政治常识告诉我们，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明规则代替潜规则，公民社会自觉监督与制约公共权力，而这正是“死磕精神”的核心诉求。它可以帮助中国人学会讲明道理，打破“潜规则”陋习，揭穿各种形式的“假大空”与“语言腐败”，并形成对公共权力的防范意识。可以预见，当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社会“讲明道理”之时，公权力的腐败空间必然会被不断压缩。

与此同时，“死磕精神”还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安全阀”，防范各种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果长期不能得到矫正或表达，很容易滋生对社会的极端仇恨心理，进而对“特定对象”乃至“无辜人群”做出伤害行为。相比而言，一个人一旦具有了明晰的“死磕精神”，他就会优先通过正常化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向极端，这相当于为矛盾丛生的社会安装了一个安全阀。

另外，从长远来看，“死磕精神”还有利于中国人训练逻辑思维，培养科学精神，激发对真知的热爱。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死磕式”争辩可以促使争辩者更审慎地思考所辩论的问题，不得不尽量把辩论的话语讲得符合“常识逻辑”，以此来说服众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逻辑思维必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训练，不再盲目相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简单说教，进而激发他们对“真理”的向往与热爱，并自发培育出现代科学精神。

总而言之，“死磕精神”有利于帮助中国人打破政治意识的“蒙昧”与麻木，培育现代个人权利意识，学会借助可以公开言说的“明规则”来维护个人正当权益，从而破除潜规则，压缩公共权力腐败的生存空间，推动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同时，“死磕精神”还可以充当一种“社会安全阀”，防范各种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从长远来看，它还可以帮助国人训练逻辑思维，培养科学精神，激发对真知的热爱，最终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

可以想见，中国若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绝对离不开民间社会对“死磕精神”的发扬。从很大程度上说，那些当今被视为“刁民”的很多死磕人士必将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推动力。最后，再次为“死磕精神”点赞，祝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理解这种精神的独特价值，并将其贯彻到各自的生活实践中，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

[【返回目录】](#)

许章润：本钱与利息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 FT 中文网]



本文作者许章润教授 图片来源：中评网

“中广”者，“中国广播公司”之简称也。话说六十多年前，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蒋氏父子败退台湾，僻居海疆，却依然以正朔自居。就国际法的虚文来看，还真的就居正不退，直到 1972 年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那个伤心时分。于是，“广播公司”前缀“中国”，文艺协会也以“中国”打头，修辞彰显的是全境辖权，更表明心存不甘。如此这般，直到近年台独去中，喙突喧腾，了犹未了。当其时，痛定思痛，切情应变，更加着意营建意识形态，遂有“中广”这一党产党务。

话说“中广”概分两部，一为“管理部门”，一为“业务部门”。制作节目是业务，而人事、会计、总务与工程，以及后来的“安全”，蔚为“管理”，简称“四大家族”。彼时情形，管理凌驾于业务，如当事人回忆，广播公司为业务而设，应该业务挂帅，而事实是管理挂帅，电台好像为管理而设。此如今日国朝大学，当为师生而设，应以师生为中心，实则党政挂帅，一切围绕着党政打转。其之坐镇中枢，从生计批发到荣誉零售，上下左右，巨细垄断，密不透风。计生委将国家的手伸向每个国民身

体，大学党政用国家的手捂住师生的嘴巴，伸向人的心灵。当此之际，可怜那叫做教授的两足物种，打工仔，丰歉肥瘦，全看东家脸色，遂迹近爬虫，多半活得安静，少数龌龊而腾达。

话题收回来。“四大家族”统辖人财物，包括要命的住房分配大权。这边厢，节目编撰睡在办公桌上，“上界足官府，公是地行仙”；那边厢，“四大家族”子弟考取军校，早不在编制，却依然保有宿舍，以备偶尔小住。纵使节目部第一红人，为了奉养岳母，申请调剂住房，他的顺位还得排在总务部一个专职誊写的文书之后。就连单位厕所，一个开放公用，另一个加锁，仅由几个家庭专用。

“第一红人”名叫王大空，生性耿介，口无遮拦，而且，难得的是秉性幽默，对此以“他们先烈”与“我们军阀”比譬解颐：“他们”是革命先烈投胎，国民党前生欠他们一笔债，他们今生来讨债，来报复，他们要拖垮中广；“我们”是军阀转世，当年迫害国民党，现在活该给他们垫底儿，受欺压剥削。

考其实，国共两党，一左一右，分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光谱的两端，表面势不两立，实则演绎的都是极权政制那一套统御把戏，因而惺惺相惜，难兄难弟。只不过，国民党再狠也狠不过奉行残酷阶级斗争哲学的共产主义，这便落花流水春去也。职是之故，花前月下，长天远水，上述“他们”与“我们”的分别，顺延三十年，移形换位，便在“他们”丢失的这块大地上再度现身，而真切具形为红二代红三代、官二代官三代之红色权贵与全体平民的对立。前者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吃相愈来愈难看，“天下为公”早就变成了“天下为公子”。每遇抵抗，小舟将覆，辄谓“不惜一切代价”。后者当兵打工，种粮纳税，时时成为“代价”，处处可能就是“不惜”的对象。

若说分别，还如当年“中广”老人所叙，在蒋氏父子，跳不出专政与民主的框框。于老蒋而言，专政是本钱，民主是利息，本钱充足之际，不妨拿出点儿利息来让你们挥霍一下。在小蒋这边，好像渐有新悟，民主自由是本钱，专政才是利息。“这一念之转，善果累累”，恰如前辈言，“他在利息耗尽之后，保住了老本”。就他们的老对头这边来看，无限江山，打打杀杀，折腾不已，同样跳不出专政民主的大框架。只不过，他们既无老蒋阳明心学训育的旧时代雅量，又无小蒋迫于时势的新时代的觉悟，总以为打江山是本钱，吃江山是利息，而且一本万利，一劳永逸，世世代代尽管坐吃等死。小酌大啖，管他酒空人散，雨打风吹。至于民主自由，劳什子，都是专政本钱放出来的高利贷，让“代价”们背着，背一天算一天。

夜读王鼎钧先生的《文学江湖》，始知当年“中广”情事，且读且记，极目送云，浮想开来，而有上述文字。赶上风吹月圆，夜半见天，真难得。若借本利之说，则捧读前辈著述是本钱，做此千字文乃利息；认识历史是本钱，洞穿现实是利息。本息之间，起承转合，畏因畏果，而开卷有益矣。 ■

[【返回目录】](#)

安希孟：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安希孟** 山西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研究教授，博士生导师，执教现代西方哲学与专业英语。本文首发于中评周刊，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安希孟**教授

我和北师大外语系 65 级辅导员杨之岭老师保持着师生友谊。杨之岭老师是上海圣玛利亚女中 1951 届毕业生。她从预科（小学五年级及六年级）到高三都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是该校 1951 届毕业生。高中毕业后，她到北京师范大学上学。1955 年毕业后留校做学生工作。从小学五年级（预科一）到高三，她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原著，有很好的英文素养，也积累了历史、社会、自然及人生知识。这是一种文化、知识、智慧和感情的累积，也就是人格素质的培养和形成的过程。她对世界文明知识有深厚功底。

我们年级几度返校，居然没有见到杨老师，不能不说是憾事。辅导员，全称是政治辅导员。那年月，北师大，一所大学，从部队调来政治部主任石森，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化战斗化军事化呀。不过，那时，在杨老师身上，你看不到教条式的说教。她平易近人，丝毫不像政治工作者那样威严（我们一般对政工干部望而生畏）。杨之岭老师并没有“突出政治”。倒是我自己，连团也没入，反而政治调子还更高一些。如今，曾经获得国外博士的她，绝没有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身影。她至今思维敏捷，关注世界社会，乐观面对人生，体恤底层忧患。失联多年，杨老师从别处打听到我。我们在手机上经常联系。

1965 年，杨老师住在北师大工五楼四单元，雷天生是班团支部书记，正要求入党，我呢，低一个档次，正要求入团。雷天生每次去杨老师家，都让我陪同。杨老师保存了 1958 年大跃进北师大代表受毛泽东接见的照片。我得知 1958 年北师大也曾大炼钢铁。

1965 年入学，我学英语比较灵活主动，48 个音素，标记在书面，叫音标。我问什么叫音标，别人

解释，我听不懂。其实就是给音素加标记，即[]符号。有几个音素我发不准，土包子嘛。如/3:/、/ə/，我总找对应的汉语音素，结果徒劳。因为中外语言文化到死也不可通约。你一定要在英语里寻找“呢嘛吧吆嗨”“匹头只座株苗根”等量词，就困难。集中双元音/ɪə/、/eə/、/ʊə/，我也很吃力。就不停向朱其英请教。我估摸着他也烦了，但碍于向雷锋学习，他敢烦不敢言。



1958年5月5日至23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提出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开始了全国“土法炼铁、炼钢”的大炼钢铁运动，
至1960年间从城市到乡村处处火光冲天，
运动造成的直接损失保守计算在当年的50亿元以上

这成为我的模范先进事迹。杨之岭老师让我在年级介绍学习经验，我把当时时髦字词都用上了，诸如“生动活泼”，“积极主动”，“总想打仗”(即，总想学习)。“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和徐寅生打乒乓球差不离。大概还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争取主动权”一类战略思想。总想发言，就是总想打仗。还有林彪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都哪儿更哪儿呀。

1966年春批判三家村时，我也想出点风头，“努力”写作，想有豆腐干见诸报刊。其实都是鸡蛋挑骨头无限上纲。咱跟三家村五柳村又没杀父之仇。有一次杨之岭老师认真帮我修改。我记得文章几乎没有层次，基本上是报纸文章的摘录加上谩骂。我的写作能力就是爱显派。我寄给《北京日报》，但终因基本文字功夫和思想理论“深度”不够被退回。我那时还不能文从字顺，其实也不能完全读懂《燕山夜话》，瞎扣帽子上纲上线，墙倒众人推嘛。但《北京日报》退稿函，我却保存多年。韩佳升同学则更绝：他给《北京日报》投稿，自始至终批判的是“郑拓”。那是胡乱上纲，欲加之罪的时代。我这不

是揭同学的短，是那个荒唐岁月可笑。



大炼钢铁运动只是全国浮夸风泛滥，
为“炼出钢铁”，不少地方砍光了千百年参天古树、将山野植被砍得光秃无毛

1966年八月，杨老师后来还在外语系劳改队劳动过，这我都忘记了。群众专政，学生红卫兵监督改造。这都什么事儿呀。有一位同学眼光锐利，看到我们的杨之岭老师鞋底图案是“共”字，硬说她把“共”踩在脚下——可制鞋匠怎么会有这念头呢。他强令杨老师黄昏薄暮时分脱鞋光脚板走回家。这个同学外号叫小“re”，wretch，坏蛋、恶棍、小流氓。这是对同学不尊重。这人是系“专政队”成员，殴打劳改中的辅导员杨之岭老师。

北师大二附中学生用帆布蒙窗，里面学生血腥殴打老师，一片惨烈叫声。韩佳升跳窗进去打人(他与那些牛鬼蛇神老师素昧平生)。他偷同年级同学衣裤钢笔书籍，被同年级抄查。衣物书本钢笔鞋袜一大堆，并不适合他穿用。文革中韩佳升人自为战，实名在《井冈山报》多篇文章批判“造反兵团”，但并不受“杆派”“瓦西里战斗队”接纳。攻打工五楼，他用强力弹弓射杀大楼。他和化学系一女保持不正当关系，彼女个子娇小，外号“根号2”，2的平方根， $\sqrt{2}$ ，意即身高一米四。恋爱多年，始乱终弃。他去太原串连，与一女工恋爱，又抛弃，彼女多次去北师大找他。

批斗杨之岭老师，大概是在外语系65级三班教室里。有人在地上画一条美女蛇，让她站在蛇头圆圈内。呵呵，原来我们尊崇的老师还是美女！批判杨老师的罪行有：杨老师和教育系于陆琳（部长夫人）有联系，曾在某处给陈云打电话。似乎于陆琳的丈夫有什么问题。同学们不知打哪儿掌握如此情报，我恍惚觉着是有人盯梢。

原北师大教育系主任于陆琳，跟随姐姐于若木（陈云夫人）到延安。文革开始，江青告诉谭厚兰：“你们学校的于陆琳是个坏女人，揪出来了没有？”谭就到军委把于揪回师大关押。师大井冈山也把

她的丈夫，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押回北师大关押。杨老师因此之故曾受牵连。



1958 年大炼钢铁运动，
用汽油桶做的“炼钢炉”试图炼出钢材、被作为“经验”推广至全国，
农民抛下正在丰收的粮食、市民放下工作，献出家中的铁锅铁具投入运动之中，
对这个运动提出批评者多数被划为“右派”

大概也有人说她 49 年前上的是上海教会学校，单这“教会”二字，就叫我们觉着是“敌人”。我对宗教那时很陌生、隔膜，但修女，是在电影里看到过的，被丑化了。我就爱把他们和帝国主义连在一起。多么可怜而浅薄的人类文明知识。

有一件事情富于人生哲理，读者们应该注意：整人者往往是得意门生激进分子心腹密友。你的培养对象红得发紫，运动一来，冲锋陷阵者，多为此等人，因为他们追求“进步”，怀抱个人动机，利益攸关，多数情况，个人成名成家意识浓厚，或者你稍不如意，他就记恨在在心。

蹇明理于 65 年入学，未几被查出肝炎休学。文革中我班同学眼见人家纷纷扯帜聚义揪斗黑帮，我们无“虎”可打，只能打“苍蝇”，也揪不出什么人，于是拿周泽兰老师开刀祭旗，写大字报愤怒声讨周泽兰迫害工农子弟的滔天罪行，在文史楼台阶上让周低头认罪。后来蹇明理返校住小红楼——高干待遇。现在看来，对于肝炎病人休学的处理并不错，否则我们都难逃厄运。杨老师后来回到教育系，但 70 年整党时，她还回外语系毕恭毕敬地征求蹇明理的意见。好像是迫害了工农子弟似的。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在我们身上都有体现。我们宿舍有一尊石膏塑像，不知道何许人把石膏像的脑袋弄掉了，放在上面，一不小心就掉落。很伤大雅。刘来牛同学和我和雷天生商议，偷偷拿到西北楼东头角落悄悄砸碎扔弃。有一位同学在教室里张贴小字报揭发雷天生反动言论十余条，都是平日无心之语。我们全班开会调解，化解纠纷，替雷天生洗白，批评了那位同学。徐秀芬同学说，中央

新闻电影纪录片，中央领导门牙脱落，微笑时用手遮嘴。一同学说这是反动言论，大家置若罔闻，她也逃过一劫。我有一次信口胡说“美国空军英雄（飞行员）戴维斯”，刘来牛同学看了我一眼，知道是口误，并没有揭发。

以下是杨老师的回忆和感慨：

她说，“我对文革时期喊打倒我的大部分人，并不忌恨。仍记得有一次从东北来了两人找我了解当时教育系二年级的一个党员学生文革中表现，因为他们想让他当领导。我说他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负责，文革中没什么问题。外调人员说，“听说他打倒你喊得很响”。我说，他当时不喊，大家就要打倒他了。外调人员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一直当领导直到退休。但有的人我感到他们有恶意，如外语系一位管教劳改的人，每天都在文史楼前训话骂人。他说我穿的塑料凉鞋鞋底图案是一个“共”字，我说这鞋是买的，他就喊口号，非叫我在大庭广众下脱下两只鞋，要我读出一个“共”字来。我觉得他很无知。最后他大声吼，叫我把鞋扔掉，光脚回去。我觉得受到侮辱。在我光脚回家时，6岁的大儿子蹲在楼前等我回家……这个人很阴暗。还有，我从美国回校，在师大校园见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某某，很惊奇他怎么留校了”。

“凉鞋问题后，我主动去教育系和陈学贤说我要回教育系，因为教育系有要整我的，但也有保护我的。我从55年毕业到65年，一直在教育系。因此我回了教育系”。

文革把人搞疯狂了。杨老师历经劫难。文革中，偶然路遇，她也回避。我当时很不理解。我多想和老师打个招呼。

我一直不解，我们年级的娃娃们，为什么单单批斗杨老师。现如今忽然领悟：北师大社教那些事儿，外语系政工干部应该了解老底。政工队伍内部或许就有裂纹。

后来杨老师回到教育系。在校园多次碰到杨老师，我们一点儿也没有热情和恭敬。那个斗争岁月，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开了个口子。

杨老师有一段温馨的回忆，兹予收录：“当年英一有一位张广慧，她很诚恳，朴实。文革开始，有一次我因血压低在半路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醒过来发现是她背我到校医院。我十分感动，但她却说“是应该的”。很快，学生也被卷进“风暴”，但在没人处，她还是和我打招呼。2004年我从美国退休回国到厦门去师大实验小学海沧分校介绍美国小学教育时，听说张广慧也在那里教英文。我们再次相见，十分激动。我再次当众讲了她背我去医院的感人事迹。后来知道她因病去世，我还打电话给她丈夫表示哀悼。文革前师生关系是亲密的、互相信任的。文革宣传成了敌对的……”

1980年1月，杨老师受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邀请并出资，由教育部选派，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从事教育考察和研究。她的业绩引起的注意，被美国两个国际性教育组织 PDK(Phi Delta Kappa) 和 ICET (International Council Education For Teaching) 接受为终身荣誉会员。她后来在美国获得教育哲学博士学位，时年49岁。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派美国留学人员中第一个取得博

士学位的人。

在太原市西山矿务局任教的马锡恒和张广慧说，80 年代，杨老师应太原市教育局邀请来并讲学，他们二位去看过杨老师。他们说是因杨老师给教育局嘱咐，他们二人才入了党，马锡恒还被提拔成西铭中学副校级干部。虽然这说法并不准确，但他们心存感恩之心。

那时候，十分恐怖十分可怕的是，你周围的人全都是一声声音，亲朋好友全系无产阶级战士爱国斗士进步分子，满口仁义道德，言必社论体，话必报刊文，没有异议，没有谬误，真理儿身，道德楷模，异口同声，千篇一律，满口官腔，正人君子。世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更悲催的。生活在进步革命道德的汪洋大会，你会不寒而栗。

真善美压倒假恶丑，种香花锄毒草，水至清无鱼，到处闯将，人人志士，满眼君子。这真是社会灾难。天天光辉耀耀，日日艳阳高照，万里无云，红太阳光芒万丈，无阴影，无遮蔽，人人捋拳怒吼，山摇地动。异见谬误错误言论扫地以尽，乃社会凶音，人间噩耗，并非动听音乐！

我写了这个东西，“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2018 年 11 月 12 日 晋阳龙城

[【返回目录】](#)

阿特伍德：乔治·奥威尔：一些私人关联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加拿大作家，是位多产的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布克奖与亚瑟·克拉克奖及多项著作奖得主。本文译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著：Writing with Intent，译者：秦传安；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1939.11.18—]

国际女权运动在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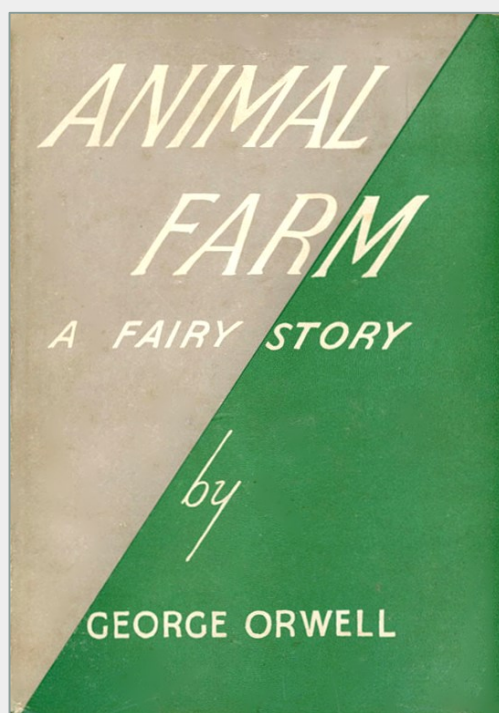
乔治·奥威尔伴我长大成人。我 1939 年出生，《动物庄园》出版于 1945 年。因此我能够在 9 岁时读到这本书。它就放在我家里，我误认为它是一本讲动物的书，类似于《柳林风声》什么的。我对书中的政治之类一无所知——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孩子对政治的看法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希特勒很坏，而且死掉了。于是我狼吞虎咽地啃着拿破仑和斯诺鲍尔（那两只聪明、贪婪而上进的猪）的冒险，还有公关高手斯奎拉，那匹高贵却笨头笨脑的马鲍克斯，那些容易被人误导、总是喊口号的绵羊，而没有把它们跟任何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说这本书把我给吓坏了，那算是轻描淡写了。庄园里动物们的命运是如此严酷，猪们是如此卑鄙、不诚实和不可靠，绵羊是如此愚蠢。孩子们对不公正有着敏锐的感觉，这是最让我苦恼的事情：猪们是如此不公正。当那匹叫鲍克斯的马遭遇意外，被拉去做成狗粮，而不是像之前答应他的那样在牧场给他一个安静的角落时，我哭得一塌糊涂。

整个经验一直让我深感烦恼，但我始终很感激乔治·奥威尔，因为他早早地就为我举起了警示危险的信号旗，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对它保持警惕。在《动物庄园》的世界里，最夸夸其谈的公共废话是胡说八道和被鼓动起来的谎言，而且，尽管很多人物好心好意，但他们被吓得闭上眼睛，对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猪们用意识形态来威吓其他动物，然后扭曲这一意识形态，以适合他们自己的目的：即便

在那个年龄，他们的语言游戏对我来说就已经一目了然。正如奥威尔教导我们的，决定性的不是标签——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教，民主，两条腿坏，四条腿好，工作——而是以它们的名义所实施的行为。

我还认识到，那些推翻了暴虐权力的人多么容易接受这一权力的装饰和习惯。让-雅克·卢梭是对的，他曾警告我们，民主制是最难维持的统治形式；奥威尔骨子里深知这一点，因为他看到了它的运转。“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一规诫很快就改成了“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更平等。”猪们对其他动物的福祉表现出了怎样一种圆滑的关切，这一关切掩饰了他们对自己所操纵的那些动物的轻蔑。他们多么爽快地披上了他们所推翻的暴虐人类从前受到鄙视的制服，学会了使用他们的鞭子。他们如何借助于他们那位巧舌如簧的新闻发言人斯奎拉所编织的语言之网，自诩公正地证明他们的行为合理，直至一切权力都落入了他们的猪爪之中，再也不需要冠冕堂皇的托辞，他们凭借赤裸裸的武力来统治。一次革命常常只不过意味着一次旋转（译者注：revolution 革命和 revolving 旋转有着相同的词根），是幸运之轮的一次转动，借此，那些原本身处底层的人登上了顶层，僭取了上好的位置，把从前的权力拥有者碾碎在他们的下面。我们应该知道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巨幅肖像贴满风景的人，就像那头邪恶的猪拿破仑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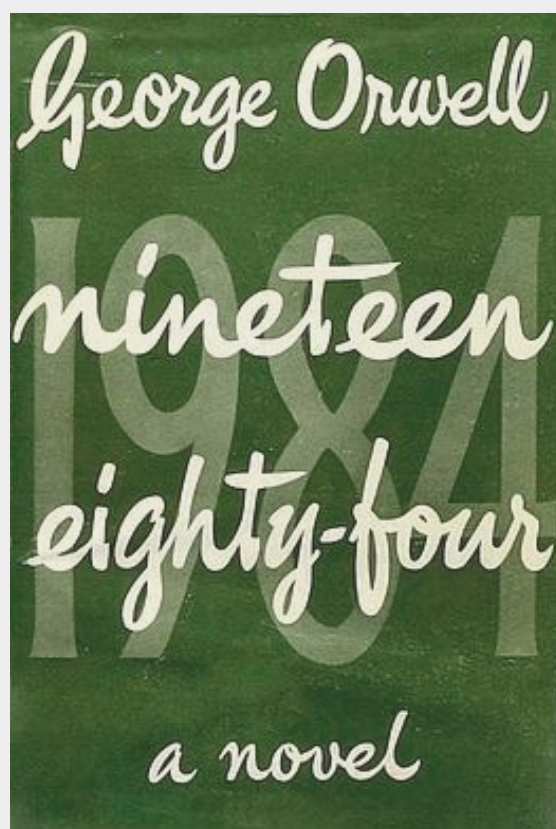


《动物庄园》（第一版封面）
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寓言

《动物庄园》是 20 世纪最引人入胜的宣告“皇帝没穿衣服”的书之一，它因此让乔治·奥威尔陷入了麻烦。那些与当前的民智背道而驰的人，那些指出令人很不自在的明显事实的人，都有可能遭到愤怒的羊群咩咩乱叫的围攻。当然，我在 9 岁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些——没有以任何自觉的方式弄明白。但是，在我们学会领悟故事的意义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故事的模式，《动物庄园》有着非常

清晰的模式。

接下来出现了《1984》，此书出版于1949年。因此我是在几年后读到了它的平装本，当时我已经上中学。后来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读这本书：它已经成为我最喜爱的书之一，连同《呼啸山庄》一起。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了它的两个姐妹篇：阿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三本书我都很喜欢，但按我的理解，《正午的黑暗》是一部关于已经发生之事的悲剧，《美丽新世界》是一部讽刺喜剧，事件不可能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展开。（实际上是一场“狂欢舞会”。）但《1984》给我的印象是更加现实主义，这大概是因为温斯顿·史密斯更像我——一个骨瘦如柴、身心俱疲的人，不得不在寒冷的条件下接受身体训练——这是我那所学校的特征——他默默地与别人为他而提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作对。（这可能是《1984》在你还是个青少年时读起来最容易接受的原因之一。）我特别同情温斯顿·史密斯的渴望：他很想在一本十分诱人的秘密空白笔记本上把他那些遭到禁止的思想写下来；我自己尚未开始写作，但我可以看出写作的吸引力。我还可以看出写作的危险，因为，正是他的糊涂乱写——连同非法的性，这是对五十年代青少年有着相当诱惑的另一个项目——让温斯顿陷入了这样大的麻烦。



《1984》（第一版封面）

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

《动物庄园》记述了一场理想主义的解放运动向一个专制暴君领导的极权主义独裁政权转变的过程；《1984》描写了完全生活在这一体制之内是怎么回事。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对于眼下这个可怕政权成立之前的生活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他是个孤儿，是集体的孩子。他的父亲死于那场

引入这一压迫体制的战争，他的母亲失踪了，留给他的，是饱含责备的一瞥，因为他为了一块巧克力而出卖了她——这一次小小的出卖，既充当了解读温斯顿性格的钥匙，也充当了书中其他很多出卖的一个前兆。

温斯顿的国家“一号空降场”的政府很野蛮。连续不断的监视，对任何人坦率直言的不可能，那位若隐若现的凶险人物“老大哥”，这个政权需要敌人和战争——尽管二者可能都是虚构的——用来恐吓人民，让他们在充满仇恨的脑残口号中团结起来，对语言的曲解，通过把过去的任何记录都塞进“记忆洞”里，从而消灭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妨再重申一遍：它们把我吓得够呛。奥威尔是在写一部讽刺作品，隐喻斯大林治下的苏联，14岁时的我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但他做得十分成功，以至于我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地方。

在《动物庄园》中没有对爱情的关注，而在《1984》中有。温斯顿在朱莉娅那里找到了灵魂的伴侣，她表面上是一个忠诚的狂热党徒，背地里却是一个喜欢性、化妆品和其他堕落场所的女孩。但两个相爱的人被发现了，温斯顿因为思想罪——内心对政权不忠诚——而受到酷刑折磨。他觉得，只要他能够在心里保持对朱莉娅的忠诚，他的灵魂就能够得救——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观念，尽管我们很可能会赞同这样的观念。但是，像所有专制主义的政府和宗教一样，党要求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个人忠诚奉献给它，然后用对老大哥的绝对忠诚取而代之。面对他在那吓人的“101室”所遭遇的可怕恐怖（那里有一个令人作呕的装置，包括一笼饥饿的老鼠跟对你虎视眈眈），温斯顿垮掉了——“别这样对我”，他恳求道，“拿它去对付朱莉娅吧。”（在我们家里，这句话成了逃避繁重责任时的一个简略说法。可怜的朱莉娅——如果她真的存在，我们将让她的生活变得多么艰难。比方说，她将不得不出席很多讨论会。）

在出卖朱莉娅之后，温斯顿·史密斯变成了一把可塑的黏性物质。他真的相信二加二等于五，并热爱老大哥。我们最后一次瞥见他，是他因酗酒而痴呆地坐在一家户外咖啡馆里，知道自己是一个行尸走肉，而且得知朱莉娅也出卖了他，与此同时，他在聆听着——一首流行歌曲：“在枝繁叶茂的栗树下 / 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有人指控奥威尔刻薄而悲观——留给我们这样一幅对未来的想像，在那里，个人没有任何机会，那个控制一切的党，其野蛮的、极权主义的靴子将永远踩在人类的脸上。但是，书的最后一章反驳了奥威尔的这一观点，那是一篇论述“新话（Newspeak）”的文章——这个政权编造出来的双重思想的语言。通过删除那些令人不快的词汇——“坏”这个词再也不许使用，代之以“双倍的不好”——通过让其他一些单词来表示与它们从前表示的意思相反的意思——人们遭受酷刑的地方是“友爱部”，消灭过去的地方是“信息部”——“一号空降场”的统治者们希望让人民完全不可能直接思考。然而，论述“新话”的那篇文章是用标准的英语、第三人称和过去时写成的，这只能意味着政权垮台了，以及语言和个性幸存了下来。不管这篇论述“新话”的文章是为谁而写，《1984》的世界已经结束了。因

此，我的观点是：对于人类精神的恢复力，奥威尔的信念比他通常给予的信任更加坚定。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奥威尔很大程度上成了我的一个直接典范——在真正的 1984 年，我开始写一部有所不同的反乌托邦小说：《女仆的故事》。到那个时候，我 44 岁，对真正的专制有了足够的了解——通过阅读历史，通过旅行，通过我在“大赦国际”的成员身份——我用不着仅仅依靠奥威尔了。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第一版与简体中文版封面

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包括奥威尔的作品——都是男人写的，视点也是男性的。当这些作品中出现女人的时候，她们要么是无性的机器人，要么是挑战政权的性规则的反叛者。她们充当了引诱男主人公的女人，不管这一诱惑对男人自己来说多么受欢迎。朱莉娅是这样，那个穿连裤女内衣的女人是这样，《美丽新世界》中那个在狂欢舞会上引诱野人约翰的女人是这样，叶夫根尼·扎米亚京 1924 年开创性的经典作品《我们》中那个颠覆性的致命女子也是这样。我想试着从女性的视点写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朱莉娅所看到的那个世界。然而，这并没有让《女仆的故事》成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反乌托邦小说”，除非就下面这个意义而言：它赋予一个女人以发言权和内在的生活，而那些认为女人不应该有这些东西的人始终认为它们是“女性主义的”。

就其他方面而言，我所描写的专制统治与所有真正的、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专制统治是一样的。它的顶层有一个强有力的小集团，控制着——或者试图控制——其余的每一个人，在可用的好东西中，他们得到最大的份额。《动物庄园》中的猪得到牛奶和苹果，《女仆的故事》中的精英分子得到生育能力强的女人。在我的书中，反抗暴政的力量就是奥威尔本人始终看重的力量（尽管他本人相信，需要政

治组织来和压迫作斗争）：普通人的正派，他在一篇论述查尔斯·狄更斯的文章中赞扬了这样的力量。

《圣经》中表达这一品质的话大概就在下面这段韵文中：“作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主身上。”暴君和权势人物都像列宁一样相信：你做煎蛋饼不可能不打破鸡蛋，目的证明了手段的合理。当他不得不做出决定时，奥威尔会相信——刚好相反——手段界定了目的。他写的时候仿佛站在约翰·多恩一边，后者说：“每个人的死亡都让我变得更弱小。”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说。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被拍成电视剧，
该剧获第 69 届五项艾美奖、包括剧情类最佳剧集奖，阿特伍德与创作团队在颁奖仪式上



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剧照

在《女仆的故事》最后，有一部分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84》。它记述的是未来几百年后举行的一次讨论会，在那次讨论会上，小说中描述的暴虐政府如今纯粹是一个学术分析的课题。与奥威尔那篇论述“新话”的文章之间的平行性应当很明显。

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奥威尔是一代代写作者们的一个灵感来源——他坚持清晰而准确地使用语言。“散文就像一块窗玻璃，”他说，是为了圣歌而不是为了装饰而选择的。委婉的词语和扭曲的术语不应当遮蔽真理。“可以接受的大规模死亡”，而不是“数百万正在腐烂的尸体”，不过，嗨，死的又不是我们；是“不整洁”而不是“大规模的毁灭”——这是“新话”的开始。正是这些花哨的措辞，把那匹叫鲍克斯的马给搞糊涂了，并强化了绵羊的吟唱。坚持“是什么”，面对的是意识形态的偏袒、民众的一致同意和官方的否认：奥威尔知道，这需要拿出诚实和大量的勇气。特立独行者的位置总是很不稳定，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发现我们的公共声音中不再有任何特立独行者时，那一刻正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那正是我们步伐一致、准备“三分钟仇恨”的时刻。

20 世纪可以被视为人造地狱的两个版本之间的一场竞赛——奥威尔《1984》中的高压政府和极权主义，以及《美丽新世界》中的假冒乐观主义天堂，在那里，每一样东西绝对都是消费品，人被设计得很幸福。随着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一时间，看起来《美丽新世界》似乎赢了——从今往后，国家控制将会是最小的，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去购物并微笑，在快乐中打滚，每当忧郁袭来时便吞上一两粒药丸。

但是，随着臭名昭著的 9.11 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袭击在 2001 年发生，一切都改变了。如今看来，我们同时面对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反乌托邦前景——开放的市场，封闭的大脑——因为政府监控报复性地卷土重来。拷打者的那间令人闻风丧胆的“101 室”一千年来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罗马的地牢，宗教裁判所，星室法庭，巴士底狱，皮诺切特将军和阿根廷军政府的诉讼——所有这一切全都依赖于秘密，依赖于权力的滥用。很多国家都有它们各自的版本——有它们自己的方式，压制令人烦恼的异议。民主国家传统上用公开和法治（除了其他东西之外）来定义它们自己。但现在看来，我们西方正在不言而喻地把更黑暗的人类过去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合法化，当然，在技术上进行了提升并神圣化了，好为我们所用。为了自由，必须放弃自由。为了我们走向那个改良的世界——允诺给我们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必须首先占统治地位。这是一个称得上双重思想的概念。就其事件的先后顺序而言，它还十分古怪地是马克思主义的。先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程中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然后是海市蜃楼般的无阶级社会，说来也怪，这样的社会从未实现。而我们得到的只是拿着鞭子的猪。

对此，乔治·奥威尔会说些什么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要说话有很多。 ■■■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 年 3 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 年 3 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 年 4 月,「**铁路改制: 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 年 9 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 年 10 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 2015 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 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 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 3 万元 (2018-2019 年度 4-5 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微博: 云豹 ONE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er9dKw> 密码: t9ed